

編者的話

这里汇集的十四篇文章，是旧中国工厂、作坊的一个缩影。它具体地揭露了资本家压榨和残害工人的种种罪行；记录了老一辈工人的苦难遭遇，以及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家是怎样剥削起家的，以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本质。

现在，我们工人阶级已经当家作主，资本家已经再不能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了。但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重温工人阶级在旧社会所遭受的剥削压迫和斗争史实，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定阶级立场，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是有很大帮助的。

目 录

苦难深重的矿工.....	1
方家坟.....	8
紡織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15
资本家的心比虎狼还狠毒.....	26
徒工血泪.....	33
南洋烟厂工人的仇恨.....	40
吃人的洋行.....	49
碼頭工人的遭遇.....	55
胶洲湾盐場簡史.....	62
盐池怒火.....	69
米行街上的“蛀虫”.....	75
残酷的压榨.....	82
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	89
双手粉碎旧世界.....	94

苦难深重的矿工

中共坊子煤矿党委通讯组 孙世祿

山东坊子煤矿的四周，白楊钻天、垂柳蔽日，蒼松一年四季郁郁青青。特别是到了春天，当桃花、杏花，还有那白皚皚的槐花盛开时，空气里漾起扑鼻的馨香，蜂蝶起舞，雀鳥歌唱，簡直是个大花园！只有当你看到高耸入云的井架，飞旋的天輪，和那滿載煤塊的电車来往奔馳时，才会恍然大悟，这原来是个矿区呀！

六十二年前，这里还是坑壑顛連、杂草丛生的荒野。一九〇一年德帝国主义者侵入我国，在这里拉上铁絲网，开了四个煤井，从此，世界上就增添了一座人間地獄……

人間地獄

这座人間地獄存在了四十七年之久，經過德、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浩劫。最初，德国資本家在这儿开了四个井，深度均在两百米以下的地方。他們为了廉價掠夺我国的地下資源，便利用最落后的“殘柱回采法”开采。那时，矿井里面巷道异常狭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人爬行，采煤工根本直不起腰来。矿下沒有通風設備，全靠自然通風，巷道里的普通溫度也在摄氏三十度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高达四十度以上。煤尘飞揚，空气污浊悶热，巷道里簡直像个大蒸籠。工人干活都是光着身子，不一会就汗流如雨、脑脹眼花、

呼吸困难，因此常常有人突然昏倒。昏倒以后，把头不但不把病人送上井去，反把病人拖到污水里去浸，直到放工的时候，才允许抬上地面。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饥饿、劳累，加上恶劣的工作环境，使许多矿工得了矽肺炎，绝大部分工人都有胃病和关节炎。

那时候，井下完全用油灯照明，按理说这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油灯往往会引起瓦斯爆炸。如一九三三年，日本经营时发生的瓦斯爆炸，死了三十六人，就是这个原因。即使是用油灯照明，资本家也不发给足量的油，起先是每灯二两油，到了国民党经营时期，发得更少，每灯只给一两油，而且还要三四个人合用一盏灯。这样一来，工人们只能在上下井时才点点灯，采煤时大都是摸着黑干，使整个井下成了一片黑暗世界。

那时，一切工种都是手工操作，每个工作面只有镢头、麻包、铁镐、“蛤蟆”锤子、钎子、筐头等。就是这样落后的工具，也是供应不足的，有时只好几个“窝里”合用一副工具。

煤采出来，全靠人运。从工作面到大门口有五六百米长，途中还要经过几个坡度很大的“上下山”，当时矿上规定，成人要背二百多斤，童工略微轻一点。干这种活的，大部分是童工，有的童工只有九岁。他们拖着沉重的筐头或麻包，脊梁和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甚至溃烂成疮。耿秋梅老大娘回忆说：“那时我的孩子下井背煤，脊梁上常年都有烂伤。我拿破布给他擦时，心里象刀绞一样，做娘的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可是有啥办法呢？家里等着吃呀！”

巷道里常有半尺多深的积水，没有排水机械，人们就站在

水里干活！天长日久，脚指头都烂去了皮，晚上睡觉前还得用秫秸把脚指头隔开，要不，第二天早晨就粘到一块去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其說是干活，真不如說是受刑罰。可是，坊子煤矿的老一辈工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折磨了四十七年之久，直到解放才見了天日。

齒骨榨油

不論德、日帝国主义，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坊子煤矿工人的剝削，真是到了“骨里榨油”的程度。德帝国主义經營时期，名义上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实际上有十六个钟头得不到休息。就拿上白班來說吧，工人每天都得在夜間两点钟起床吃飯，三点多钟就得赶到矿門口排队等候搜身，然后到賬房外排队領油牌，直等到六点钟下井；晚上六点钟下班以后，还得到賬房外面排队，領取那三斤橡子面，或二三斤烂地瓜，因为家里等着下鍋，这样起碼也得八点钟到家，斬头去尾，一天也不过只睡五六个钟头的觉。到了日本人和国民党經營时期，因为資本家和把头还常常額外找些借口，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常使工人連三四个钟头的觉都睡不足。

劳动强度高，劳动時間长，按理說工錢該高些吧，事实并不是这样。德国人开矿时，工人每天收入二角到三角（約二斤小米的价錢）；日本人經營时，工資名义上提高到四至六角，可是这时米价却涨了四倍；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工人工資由二斤豆子降低到斤半，起先发的是綠豆，后来又改成发橡子面，要不就发掺有猪毛、头发的烂豆餅和粉渣子。就連这样低的工資，工人們也不能全拿到手，資本家、包工头、把头等，又想出很多花招，进一步地盘剝工人。例

如：一种是“拖欠工資”。資本家們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不按时給工人发工資，而把这些錢存到銀行里牟取利息。日本人經營时期，从五百工人身上扣发工資四万多元；一九二六年，中国包工头張鵬云曾九个月不发工資，直到“实业銀行”倒閉，才慌忙地发了一半工資，而工人接到手，已是一把廢紙了。工人李天堂就是被这件事情气瘋的。再一种剝削工人的花样是“預借工資”，实际上是趁火打劫。資本家、包工头們瞅到哪个工人遭災遇难时，就叫他“預借工資”，然后强迫工人給他們加班加点地干活。最毒辣的一手是“抬高物价”和强迫工人們“送礼”。坊子煤矿附近的商号，都是煤矿資本家、包工头、把头們开的，或是由他們入股的，一到工人們領到工資，資本家們就抬高物价，敲工人們的“竹杠”。那时，在坊子煤矿做工都是包工制，由外国資本家包給中国的包工头或資本家，工人們要想来干活，逢年逢节就得給包工头或把头“送礼”；要不，他們就故意派重活給你干，要你到危險的地方干活，或是故意扣发工資，借故打罵，以至开除，硬掉你的飯碗。

經過层层盘剝，工人到手的工資实在少得可怜了。“下窑汉，下窑汉，三尺腸子閑着二尺半。”这就是当时矿工生活的写照。矿工王学法全家五口人，有三口在矿井干活，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頓飽飯。在解放前夕，矿工干一天苦工只挣伪币十二万元，每斤地瓜却要卖七万元，別的就可想而知了。連口都糊不住，別說穿啦，工人丁林瑞直到十五六岁还光着腚，他母亲只好到乱葬崗子拣些破袄，用柴火烤烤給孩子穿上，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他的姐姐卖給人家作童养媳。象这样卖儿卖女的事情，在工人当中是太多了。讲到住宿，那

也很慘。單身礦工們住的“集體宿舍”，只是在地下挖個窖子，蓋點麥秸，鋪點爛草，一個十五平方米的地窖子，起碼也要住三四十個人。夏天潮濕悶熱，蚊子蒼蠅布成了陣，工人們大都長了疥瘡；冬天冰凍嚴寒，四面透風，三九天工人沒有被蓋，就揀些爛麻包披搭着身子，大雪封門時便擠在一起。

“一人下窖全家黑”，這句話一直流傳到解放為止。解放前的四十七年間，礦上只有一个小澡塘，那是專供資本家、包工頭、高級職員和大把頭們用的，工人們沒有份。工人勞累一天，跑回家去就得趕快睡點覺，準備第二天好去上班，想洗連時間也沒有，怎麼能不“全家黑”呢？

非人待遇

不光生活苦，礦工們的人身自由也被剝奪了。從德國開礦起到解放前，礦上都駐扎着大批軍警，礦的四圍都拉上了鐵絲網，修起碉堡，設上崗哨，工人上下班都要經過門崗搜身，誰不順他的眼，就得挨頓毒打。工人王成美因為腰里扎着一條皮帶，被門崗搜了出來，便加了“土匪”的罪名，當場打了個半死，接着被扣押了起來。

礦工們在資本家眼里根本不當人看。他們叫采煤工是“斃頭”，裝車工是“鏟子”，背炭工是“筐頭”，搬運工是“二驢子”。礦工們的安全沒有絲毫的保證。一九〇七年，德國資本家們不顧工人的生命安全，竟把炸藥庫設在井下，結果引起自然大爆炸，殺害了一百六十八個工人；一九三八年日本資本家故意製造透水事故，害死了八十三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資本家明文規定，礦工死在井下，才給一口薄皮棺材錢；如果在井下受了傷，不管傷到什麼程度，只要上到

井口还有口气，他們概不負責。工人刘孝在井下砸断了腿，本来可以治好的，但是因为資本家不給錢，自己請不起医生，落成了殘廢。一九四七年秋天，三、四立井的矿工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一部分工人起来罢工，矿上的資本家馬上报告，蔣匪軍立即派来馬步兵包围了矿区，刀出鞘、枪上膛地逼着工人上工。資本家同蔣匪軍就是这样勾結在一起，殘酷地压榨着煤矿工人。

世上乐园

一声春雷，劈开了这座人間地獄。一九四八年四月，濰坊解放了。从此，坊子煤矿回到了人民手中，矿工們彻底翻了身，成了矿山的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矿工們發揮了冲天的干劲，尽快地修复了旧矿井，并且把一立井的大巷，鋪上了铁軌，电車来往通行。現在別說运煤是用車，就是工人上下井也可以坐电車了。工人們下井时，都帶充电的矿灯，各条巷道里也都安上了电灯，井下一片通明。为了保证职工們的健康，解放后不久就裝置了一百一十二台鼓風机。全矿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党特别关怀职工安全，強調“不安全不生产”，意外事故极少发生。解放以来，杜絕了瓦斯爆炸。排水系統也是良好的，井下現有大小水泵一百三十多台。此外，工人們还按时領取工作服、手套、安全帽等劳动保护品。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生产突飞猛进地发展着，一九四八年产煤九万七千吨，一九五八年产煤七十八万吨，到一九六〇年猛增到一百五十万吨。解放后十四年的产煤量，接近解放前四十七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六。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生活水平和工資收入都在不

断提高。

解放以来，全矿修建了三万三千六百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全都是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既整齐又美观。全矿现有男女浴池五个，建筑面积达四百七十八平方米。此外，矿上还建立了专为职工服务的医院、托儿所、疗养所、商店、理发馆、服装店、影剧院、菜园、果园，以及职工业余学校和职工子弟小学。这就改变了坊子煤矿的面貌。对于这些变化，老工人们看得最清楚，他们说：“旧社会的坊子煤矿是个人间地狱，新社会的坊子煤矿是个大乐园。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哪里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方 家 坟

邢雁 王元 舒野 东升

在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煤矿太信二井南面的一片墓地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石碑上铭刻着十个醒目的大字：“永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这是辽源市人民为纪念屈死在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手中的矿工而修建的。石碑的周围，埋葬着无数死难阶级弟兄的英灵……

几万矿工的生命

矿工墓这一带，原来叫“方家坟”，它是日伪统治时期西安煤矿（辽源煤矿前身）最大的柜头——“方家柜”的万人坑。

一九六三年九月，太信矿一千三百多名职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这里凭吊和祭扫。祭扫的人们，清除浮土，打开了这个方圆将近一平方公里的墓地。在这里，白骨嶙嶙，阳光一照，闪闪有光，尸骨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人们屏住呼吸，含着眼泪，默默地看着这些死难阶级弟兄的遗骨，像是走进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墓地的东南坡上，这边一个坑里埋着三具尸骨，那边一个坑里又一竖一倒躺着两具骨骸；在一处大约二百多平方米的地方，竟挤着一百七十九具尸首；肩靠着肩，腿压着腿，尸体和尸体之间，只有拳头大的距离。这些尸骨有的歪着头，

有的蜷着腿，有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的铁丝捆绑着。还有的尸骨的头部、臂上、腿上残留着深深的刀痕，有的尸骨的骨盆被烧得焦黑……据一些逃出魔掌的老工人说，这些死难者没有一个正常死亡的，他们全是不甘心忍受那残酷的压迫，起来反抗，或是企图逃走被抓了回来，给折磨死的，其中很多人还没断气，就被拖到这里给活埋了。

在山丘的西坡，有一块方方的草地，周围用草绳拦着。这是当年的“炼人炉”。据老工人回忆，“方家坟”是一九四一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坟地就埋满了。从那以后，就在这里修了个炼人炉。成百上千的尸体和还未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里烧成灰烬。在日伪统治的那些年月里，炼人炉昼夜冒着浓烟，很长时间从未熄灭过。辽源解放已经十七年了，炼人炉遗址上的骨灰和焦土，至今还有一尺多厚。

“方家坟”究竟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笔血债已经无法计算了。根据日伪西安煤矿的材料看，四年的工人登记卡片，共有九万二千四百三十八张，而当时这里实有的矿工仅仅一万八千人左右，可见，至少有几万人在这里断送了生命。

从火坑到地狱

人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人间地狱的？我们访问了这里的老工人和死难者的家属。他们谈到自己的亲身遭遇：

那是一九四〇年，我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真是“村村良田变荒野，户户烟囱不冒烟”。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一大批一大批的农民破产了。他们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希望

找到一条活路。正在这时，一批招骗工人的毒蛇来到了这些地方。他们到处宣传：“到东北学手艺去！那里有吃有穿。”于是，这些穷苦农民就这样受骗了。他们一批一批地被装进了“闷罐车”，车门一锁，吃、喝、拉、撒、睡，都不许出来。每天两个掺豆腐渣的窝窝头，根本没法拿，得捧着吃。渴了，连口干净水也喝不上。他们就这样背井离乡，被押运到了“西安煤矿”。本指望逃出火坑，在“关东”找一条生路，哪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人间地狱。

人们进了方家柜，就像鸟被关进了笼子。方家柜的四周，围着两道铁丝网，中间夹着一道高压电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多高的土墙。从各地招来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全部关在这个包围圈里。包围圈四周有七道卡子门，每个门都有两个提着镐把的外勤把守着。六个卡子门只准矿工进，不准矿工出，连伙夫出门打水都要像牲口一样带上“捂眼”，后面还要跟上外勤监视着。只有一个卡子门是为矿工开的，而这个门只出不进，这就是通往“方家坟”的所谓“鬼门”。

悲惨的矿工生活

半夜三点，炕长就吼叫着逼工人上班。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矿工们，蒙蒙矓矓，慌忙揭开身上的破棉被、麻袋片，有气无力地爬下炕来。几个童工的动作稍慢了一点，炕长的镐把就打在他们的身上。

一桶发了霉的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饭，往地中间一泼，有碗的就盛上一碗，没碗的就用柳斗帽盛，用手一把把抓着吃，再喝两口河沟里的污水，就被外勤赶着挖煤去了。一群赤着脚的矿工，在满是冰雪的道路上吃力地移动着，他们先在灯

房內領了礦燈，到井口才能穿上昨天下班時脫下來的破膠鞋。他們身上披的是破衣爛片，沒有衣服的就將破被子挖個洞，套在脖子上，攔腰一系，勉強遮體，在刺骨的寒風中抖成一團。礦工們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了一天的沉重勞動。

井下，昏暗的燈光照着低矮的巷道。遍地積水浸泡着腐朽了的礦柱，散發着發霉的氣息。井下巷道毫無規則，生產秩序非常混亂。通風不好，氧氣稀薄，有的掌子憋得透不過氣來，許多人暈過去就再也沒有醒過來。採煤掌子的上頂板離底板有幾米高，在微弱的燈光下，根本看不見上面的情況，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落下石頭把人砸死。在這種生命毫無保障的條件下，工人們為了幾個橡子面窩窩頭，每天在把頭逼迫下，要干十三四個小時的活。

夜晚，該是平靜的時刻了吧，而礦工連睡覺也不得自由。屋里有炕長監視，屋外有外勤、把頭巡邏。睡覺時還必須朝着一個方向，後一個人的面，朝着前一個人的背，誰也不許看別人一眼，更不許吭一聲。有一夜，礦工張景富睡得迷迷糊糊，不知不覺翻了個身，和後面的人對了面，他們立刻被監視的外勤拖到柵房，每人打了十鎊把。又一次，童工譚金章凍得實在忍受不住，悄悄向身後的另一個童工說了聲“冷”，外勤聽見了，就把他們倆拖下炕來，逼他們面對面跪在地上互打嘴巴。同是苦難的兄弟，誰能忍心下手呢！不打，外勤就親自動手，頓時把他們打成了兩個血人。礦工夜間大小便也是一道難關，不論刮風下雪，都得光着身子出去。有一位老礦工小便時間稍長了一點，就被外勤一脚踢進了糞坑……

這就是礦工們每天的悲慘生活。

生命毫无保障

在方家柜，矿工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井下被車軋死的，石头砸死的，瓦斯燒死的，缺氧憋死的……天天都有。井口設了停尸房，专门雇了两个拉尸的。每天都要从井下拖上几具矿工的尸体，凑够一車，就拉到万人坑或炼人炉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井下瓦斯爆炸，三百多人被活活燒死。有二十多人侥幸生存，他們掙扎着爬到井口，哪知道日伪統治者为了保护設備，早用紅磚把井口封閉了。解放后，打开封閉牆，才發現这二十多人橫七豎八地倒在封閉牆边。有的双手樞进地里很深，惨不忍睹。

还有一次，眼看采煤掌子就要塌頂了，把头們还硬逼着刘向、刘瑞等五个工人进场子。他們刚走进去，只听到“轰”的一声，頂塌下来了，五个人活活被埋在煤堆里。

那时的矿工，誰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常常下井是活人，上井就成了方家坟的尸体。方家柜的北边有座小桥，那时，每当矿工下井，总有矿工的亲属翘首遙望，目送亲人，默祝亲人平安。但是有多少次，他們迎回来的却是尸体。人們含着眼泪把这座桥叫“望魂桥”。

生病，对矿工來說，就意味着死亡。鞠永发的父亲因饥饿和过重的劳动得了重病。狠心的把头赵玉春却說：“脑袋硬不硬？硬就得挖煤去。”他父亲被逼得沒法，硬挺着干，不料左脚被砸伤了，酒盅大的伤口，鮮血不住往外流，炕长嫌他有碍“卫生”，把他扔进“病号房”。这是間阴暗、潮湿、无人过問的大房子，工人們叫它“北六号”。土炕上躺滿了瘦得脸上只剩下一对大眼珠子的人，呼喊声和惨叫声連成一片，橫七

整八的尸体发出刺鼻的腐臭气。鞠永发的父亲来到这里，很快就死了。

在方家柜，日寇爪牙、把头們可以任意残害矿工的生命。一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柜，吃橡子面、喝污水得了病，向把头請假休息一天。把头恶狠狠地說：“好吧，晚上給你‘治’病。”小伙子不知他們的毒計，以为真給治病哩，痴心地等着。到了晚上，几个把头进来了，把一把燒得通紅的铁鍬端到小伙子面前，厉声喝道：“起来，給你治病！”不由分說，把他硬按在铁鍬上。一声惨叫，一絲絲青烟升上头頂，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輕人就这样活活給折磨死了。

在这里，活人和死人都是矿主和把头发財致富的来源。把头每騙来一个新的矿工，可以从主子那里領五十元的“募集費”；每死一个矿工，也可以領八十元的“吊慰金”。狠心的把头为了使自己多賺錢，巴不得矿工們尽快地死个干淨，好再換来一批新的。

过去的資料載明：这里矿工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半。他們工作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不到全矿工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矿工，在这里只活了半年左右，就被折磨死了。

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他們豢养的封建把头，在这些累累如山的矿工尸体上，建立了自己的剝削家业。一切都是为了牟取最大的利潤，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剝削者們对矿工这么狠心毒辣，一直榨到矿工剩一副枯骨，然后棄之于荒山了事的根本原因。

日月換新天

辽源煤矿从解放到一九六四年，刚刚过了十七个年头，

但是，这里已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騎在工人头上罪大恶极的方家柜大把头蔡九齡，已經被人民政府在矿工墓前枪毙了。

当年的狼狗圈、“鬼門”，現在都已經不見痕迹。在过去死尸房一带，早已盖起了一幢幢新的职工宿舍。矿工們过去住的大房子的旧址上，已經建成了矿工子弟小学，从那儿传出来《东方紅》的嘹亮歌声。

当年的童工譚金章、鞠永发，都已經成了共产党员。譚金章是太信矿一井十三段的党支部书记，曾被选为市人民代表；鞠永发被評为先进生产者，被誉为“紅色管家人”。

当年被摧殘的老工人，有的当了矿、井的领导干部，有的已經退休，正在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

如今的矿井，面貌已經煥然一新，工人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党組織特別重視安全生产，为了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增設了許多防护設備，采取了許多安全措施，很多笨重的体力劳动已經为机械化所代替。

但是，人們並沒有忘記过去，在人們的脑海里都深深銘刻着：

永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紡織工人的苦難和鬥爭

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廠從開辦到一九六三年，已有七十四年的歷史。它的前身是通益公（一八八九——一九一三）、鼎新（一九一四——一九二八）、三友實業社（一九二九——一九四二）和杭州第一紗廠（一九四三——一九四九）。提起我們工人在舊社會里吃的苦，我們這些老工人就火上心頭，恨死那些喝人血的資本家，恨透那萬惡的舊社會。

從前的紗廠什麼樣

舊社會，我們工人被叫做“紗廠鬼兒”，挨打、受罵簡直是家常便飯。資本家為了進一步盤剝工人，制訂了許多罰規。鼎新紗廠時期，廠里規定：工人“折斷一只木錠罰二角”；“打破一塊玻璃罰四角”；“在廁所內吸煙罰一元”，更加莫名其妙的是，我們工人說句笑話，也要“罰洋五角”。而當時的每日工資只有六分到一角六！資本家豢養的名目繁多的走卒——督工、監工、巡查、領班、指導員、“拿摩溫”（工頭）等，也一起參加了剝削壓榨和敲詐勒索，每逢過年過節，或者借用紅白喜事、陰壽陽壽等名義，硬要缺衣少食的工人向他們“贈送”厚禮。送得少的，就調你去做難做的活；不送的，不出三日，就會無中生有地找個借口把你趕出廠去。要說這種剝削有多重，只要舉一個例子就能說明，有名的惡工頭孟阿

巧，用这种年节的“礼物”作本钱，竟在拱宸桥开起了一爿棉布店！

为了多剥削，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地延长工作时间。从通益公纱厂到杭一纱厂这五十多年中，我们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起码是十二个钟头，甚至十六个钟头。吃饭也不停车，工人只好站在车头边，接几个纱头划一口饭；有时纱头断得多了，等接齐，饭上早已盖满一层齷齪的飞花……真是不吃肚皮饿，吃下泪成河啊！

资本家的心在铜钱眼里翻跟头。那时候的车间，劳动条件坏到了极点。厂里根本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夏天车间里热得象蒸笼，我们工人常常昏过去。冬天，狡猾的资本家一面发给每个工人一个红萝卜，说是“预防伤风”，一面暗地里却增加车速，累得工人喘不过气来。

野蛮的抄身制

从通益公纱厂开工的那天起到解放前，“抄身制”就象毒蛇一样，紧紧地缠在我们工人身上。资本家豢养了一批抄身婆和抄身汉（大部分是资本家的亲戚），在厂门口安上抄身栏，栏的旁边放着一只木笼。男女工人每天下班出厂门的时候，一个个浑身都要被搜查；如果有谁违犯“厂规”，就被关进木笼。资本家为了对付工人，还制造了各种刑具，订立了罚款、开除等等条规，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啊！

在日本鬼子侵占杭州的时期，细纱车间有个女工叫阿八嫂，下雪天没有棉鞋穿，两只脚生满了冻疮。她在地上拣了些烂棉絮包在脚上，又用一些棉纱头和布条条儿捆上。想不到被抄身婆搜出来，她竟遭了大难。那是个风雪交加的腊月天，

日本鬼子把她的衣服剥光，吊在厂門口的一棵大树上。每一个日本鬼子經過这里，都要打她一頓。更恶毒的是，有一个日本鬼子，竟用火紅的铁棍野蛮地捅她的下身。

迫害工人的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可以看到。藤条、木棒等刑具，一年到头挂在大門口，要不就捏在抄身婆和抄身汉的手里。工人出入厂門，看到这番阴森森的景象，都气得咬牙切齿。要是有人一不当心，把火柴或者紙烟放在衣袋里，到門口被搜出来，就会先挨一頓藤条，然后，一根火柴罰洋五角，一支烟罰洋一元。特别是童工（一些不大懂事的孩
子），她們买不起花袋，干活时就把一些接头用的棉紗塞进袖管或衣袋里。干上一天的活，累得小腿和胳膊都不会动弹了，哪里还会把一些事情想得那么周到呢！下班忘了把棉紗拿出来，叫抄身婆搜到了，不是挨打受罵，就是脸上被塗上柏油，带到各个車間去“示众”。資本家还說这是“从寬发落”呢！

在抄身婆和抄身汉当中，要算一个姓孙的資本家的小姨子——般大麻婆最凶。这家伙滿脸麻点，一口金牙齿，眉毛倒豎，活象个母夜叉。一九三一年年底的一天，擋車工爱宝来了月經，站了一整夜，累得腰酸背痛，下班的时候已經是面色惨白，步履艰难了。可是般大麻婆把爱宝拉住，粗野地从胸部摸到下身，突然后退一步，恶狠狠地問道：“下身藏着什么？”

爱宝說：“是身上不干淨……”

般大麻婆眉毛一豎，說：“不相信，拿出来看看！”

这不是存心当众侮辱一个姑娘么！我們早已忍不住气了，便拥上去跟抄身婆評理。

殷大麻婆一面打着官腔，一面仍然拉住爱宝。爱宝气得差点昏过去；停了好久，她才忍住气，一下子把月經帶抽出，把它擎在殷大麻婆面前：

“殷大麻婆！你不要杀人不見血！你看！你看！这是什么——是血布？还是紗？你說！你說！”

誰曉得，殷大麻婆竟耍起无賴来了。她含血噴人，說爱宝“侮辱”她，就“拍”地打了爱宝一个耳光！

我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就一下子冲了上去，把殷大麻婆痛打了一頓。

当天夜里，我們分头把爱宝姑娘受侮辱的事情，告訴那些不明底細的兄弟姐妹，他們听了都非常气愤。于是，我們决定罢工，团结起来向資本家斗争。

第二天，全厂两千多工人都停車不干活。大家推选代表去找資本家說理，要求撤換抄身婆，今后不得无礼搜身；并且要厂方向工人道歉。經過一番斗争，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厂方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換四个抄身婆；响了三遍汽笛，表示向工人道歉。

被摧殘的儿童

鼎新紗厂的資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竟雇用了近半数的八岁到十二岁的童工。童工的工資特別低，当时一般工人每天工資不到两角錢，童工只有六分到八分。当时的米价，五六元一担。童工要想吃飽飯就更难了。

一九一五年六月大伏天，車間里悶得象蒸籠一般。童工陈阿冬（蕭山人，从小死了父亲），有气沒力地在細紗車弄堂里接头、扫地。因为吃不飽，加上天气特別热、活难做，她

的車子“堆烂污”了。童工头麻婆阿凤看见了，拿起一个筒管扔去，正打中阿冬的额角，顿时鲜血直冒，可是又不敢哭出声来。麻婆阿凤站在旁边，死盯住她。阿冬顾不得疼痛，吓得不知干什么好，手直发抖，她拔起一根纱来接头，往锭子插下去，不料又落到地下。麻婆阿凤“拍”一个耳光打了过去，还骂道：“死坯！你不想做了，罚洋三角！”马上，一块罚款的牌子就挂在她的车头。这块牌子象一条铁箍套在阿冬的头上，她越来越感到沉重，连一步也迈不开。她惊慌得不得了，就晕倒在“弄堂”里。

在工人群众的抗议下，麻婆阿凤才准许阿冬回家去休息。可是，她走到半路，就倒在路旁的一丘田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人们发现了阿冬的尸体。

这是解放前不久的事：一个炎热的夏天，童工桂珍的姆妈得了严重的伤寒症，还只十五六岁的小桂珍，只得担负起一家的生计。桂珍因为从小就做工，身体给折磨得非常瘦弱矮小。

离中秋节只有两天了，桂珍姆妈的病突然加重，桂珍坐着陪了一夜。天傍晚，她刚合上了眼，上工的汽笛又响了！她看了看已经昏迷入睡的姆妈，放下了那顶补满补钉的破帽子，提起饭盒便赶忙向厂里走去。

桂珍白天已经疲劳到极点了，做起夜班来，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

“阿大姐……我……实在吃……吃不消了。”桂珍斜倒在阿大姐的怀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哪知道被“拿摩温”看到了，那个家伙凶狠狠地跑过来说：“又在装死啦！要死，就到家里去死！”

桂珍越来越支持不住了，她全身滚烫滚烫的，四肢发软，终于倒下去了。

“啊呀！救人哪！”阿大姐忙喊。姐妹们闭声一齐奔过来探望，有几个小姐妹把她抬着往家里送，哪知刚走在半路，可怜的桂珍就断了气。

被旧社会夺去生命的童工，何止百个、千个、万个阿冬和桂珍啊！

阿三娘的经历

我们厂里有个阿三娘。阿三娘姓陈，原名陈素香。解放后，她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家，一心搞好生产，是厂里受人敬重的劳保委员，因此，博得了—一个尊敬而又亲热的称呼——阿三娘（现在正式的姓名是陈阿三）。可是解放前，她却叫董阿三。为什么改名换姓？这里也有一段心酸事。

三十五年前，阿三娘——陈素香在三友实业社杭厂做工。那时候呀，女工连生仔儿的权利也没有，怀孕就象犯罪。有的怕敲破饭碗，只好偷偷地用布把腹部裹紧，恶心呕吐都得背着人，熬到足月，仔儿往往偷偷生在厕所里。可是仔儿一落地，除名的威胁就紧接着落在妈妈的头上！有一年秋天，陈素香生下了第一个仔儿。为了生活，为了少挨些工头的皮鞭，为了免去“除名”的祸殃，没等满月，她就摇摇晃晃地上工去了。

她刚走近自己做工的那部车前，不料工头就迎了上来，板着脸，阴沉沉地对她说：“陈素香，眼房间有请。”

她带着恐惧的心情走进眼房间。戴眼镜的管事抬了抬眼，假笑着说：“恭喜恭喜，有孩子啦，那要好好照管啦。好吧，

你今天起就别来上工了。”

陈素香被除名的消息传到了工友们耳朵里，个个不安，人人不平！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凑巧这时有个叫董阿三的女工病死了。工友们就设法掩护着陈素香，让她顶着董阿三的名字去上工。可是，董阿三头颈生着一个瘤，陈素香为了瞒过工头的耳目，只得天天用纱布裹着头颈来上工。靠着阶级兄弟姐妹的扶持，陈素香还没有在苦海里淹死。不过她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真名实姓。

阿三娘出生在一个十分贫苦的络丝工人家里。父亲的工资很低，根本不够一家人喝粥。她八岁就去给人放牛、抱伢儿。十五岁进袜厂做工，从清晨摇袜到半夜，瞌睡得常常差点把头撞在袜车的钢针上！每天得到的工资，不到一角钱，可是，又是押金，又是租金，连蜡烛头也要自己出钱买。剩下的钱只够喝点连壳的麦糊，吃点胡萝卜。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只有一件讨来的破棉袄和一条破单裤。

结婚后，夫妻两人做工一双苦，还是谁都维持不了谁。她一无钱送礼，二无“牌头”可靠，整整当了八年“老饭桶”，工头们还不许她学技术。有一次，她想偷偷去学，一下轧伤了手指头。恶工头根本不管她手伤如何，先一口咬定她弄坏了车子，罚了她二角八分钱。她等于白白做了四天王！

一九四六年，她丈夫被无理解雇，生活的重担便落在她一人肩上。那年冬天，她那个七岁的儿子病了，家里穷得连一粒米都没有，哪有钱请医生看病。不几天，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了！

这桩不幸的事情，使她伤心到极点。她一共生了八个孩

子，可是养活了几个呢？連刚死的儿子在內，已經有七条小生命被夺去了！仅仅剩下的独根苗苗，能不能活？她真不敢想啊！

阿三娘住的一間小屋里，冬天像冰窖，夏天像蒸籠。屋子里面有什么呢？用借来的三块鋪板，搭了一张床，破被子补得象馬蜂窝似的，一条又薄又破的旧棉絮，两只高脚凳和一只破飯籃。几只飯碗，还是工友們送的。除此以外，还欠了人家八十块钱！这就是旧社会一个女工的三口之家的全部“财产”。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号，杭州解放了，阿三娘也翻身了！她这个粗紗女工，紡了几十年的棉紗，可是自己和家里的人穿的都是討来的破旧衣裳。解放后，她第一次踏进布店，給儿子、給丈夫、給自己各剪了一套新布衫料，从此，阿三娘才开始了新的生活。

嬰兒地獄——“小人監”

“生儿苦，喂奶育儿更加苦！”解放前，我們紗厂里哪有什么托儿所，僥幸生下来的伢儿，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带到車間里来。

一天，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一卷笨重的粗紗，突然掉进了紗籠，恰恰打在女工长云嫂的伢儿的胸口。当时，車間里声音嘈杂，大家忙着干活，誰也沒有注意到这件事。好容易盼到下班，长云嫂抹掉头上的汗水，匆匆伏下身去抱伢儿。这时，她才发现伢儿的身体已經冰冷、僵硬了！

这样的惨事，屢次三番地发生。狡猾的资本家眼看这样下去，将会激起工人們更大的憤恨，这才勉强办起个放伢儿

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阴暗潮湿，又闷又臭，只有三块铺板，有两个瞎眼老太婆，说是雇来带伢儿的。此外，这里还有筒管，破油花，杂七杂八的东西东倒西斜地堆放着。所以工人们都把这个地方叫做活地獄——“小人监”。

夏天，“小人监”里烫得似火燎，苍蝇叮满伢儿的脸孔，蚊虫咬肿伢儿的手脚；冬天，“小人监”又冷得要命，伢儿冻得哇哇哭，小手象个红萝卜，尿里卧，屎里睡，真活受罪！女工一天做十几个钟头工，这么长的时间，只可以去喂一两次奶，多去一次，就会挨“拿摩温”的痛骂。

织布女工黄宝林有个女儿也放在“小人监”里。每次喂糕糊的时候，碗里总少不了几十个蚂蚁。有一次，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她喂完糕糊，来不及给伢儿抹抹嘴，就走了。等到她下班以后去喂奶时，只见伢儿滚在铺板里角已经哭不出声了。她把伢儿抱起一看，嘴边黑糊糊的一圈，全是蚂蚁！就这样，这个伢儿不到四个月，就活活地被折磨死了！

有一次，女工徐莲珠做夜班，做到半夜，已有六个多钟头没给伢儿吃奶了。这时，小姐妹也来告诉她，说她的伢儿在“小人监”里哭得很厉害。莲珠就奔去给伢儿喂奶。她跑进“小人监”，刚抱起伢儿换好尿布，喂了几口奶，“拿摩温”在外边叫了：“徐莲珠！你这么久在干啥？车子关起来，损失你来赔吗？”徐莲珠答应着，不忍看伢儿活活饿坏，就偷偷把伢儿带进车间，放在一个破筐里，上面盖了一块布。

徐莲珠正担心给“拿摩温”看见要挨骂，忽听得伢儿哇哇地大哭起来。她连忙跑过去，低头一看，不禁浑身颤抖起来，原来一个粗纱车上的“秤砣”从车上掉下来，正打中伢儿的胸口上。她急忙抢步上前，拿掉“秤砣”，拉开伢儿的衣襟，只

見白嫩的胸口上，黑紫紫的一塊烏青，有碗口那麼大，佻兒疼得四肢亂伸。徐蓮珠心慌意亂地抱着佻兒去請假。“拿摩溫”連看也不看一眼，冷冰冰地說：“咄！這點小毛病，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打門票（請假）沒那麼便當！”

徐蓮珠說：“我不能看佻兒活活疼死啊！”

“拿摩溫”獰笑着說：“死掉倒是福氣，恐怕死不了。”

徐蓮珠沒辦法，只得又忍痛把佻兒放在“小人監”。

下班的汽笛聲一响，徐蓮珠連身上的飛花也不揮，象飛一般地跑向“小人監”，輕輕抱起佻兒，又一口气跑到大門口。大門口等待抄身的隊伍排得長長的。徐蓮珠擠上去，懇求地說：“我佻兒壓傷了，讓我先走一步吧！”

抄身婆向她瞪了一眼，狠狠地把她一推，說：“什麼傷不傷，我可管不着這麼多。快去排隊！”徐蓮珠險些被抄身婆推倒；懷里的佻兒碰着了傷口，又亮着沙啞的嗓子哭了起來。

出了廠門，徐蓮珠急忙趕到家，為了請醫生給佻兒看病，好不容易向鄰居借了點錢，可是錢不夠，醫院不給治。到了夜里，佻兒突然全身抽搐，眼珠泛白，小眼角里流着一串串淚水。過了一會兒，就在姆媽的懷里斷了氣。

解放後，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關心工人的生活。我們廠里辦起了托兒所，產婦和佻兒都得到很好的照顧。解放前在“小人監”里死了女兒的黃寶林，一九五三年生了個男佻兒。因為先天不足，又缺奶水，這佻兒長得很瘦。想不到在托兒所阿姨們的細心照料下，沒多久，佻兒就漸漸地胖起來。黃寶林高興得逢人便說：“多謝黨，多謝社會主義，多謝工廠托兒所帶給我們女工這麼大的福氣！”受盡階級壓迫、吃盡剝削苦的徐蓮珠，她的女兒解放後也在我們廠里做工。她女兒

生的伢儿，长得象小老虎一般健壮。徐蓮珠常到托儿所去看外孙，听到小外孙亲热地叫“外婆”的时候，她禁不住流下热泪，激动地说，“过去的孩子如草，现在的孩子是宝。多亏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啊！”

（摘自金蔭桥、李传忠、高鈞、张新、刘耀林整理的《杭棉厂史片断》一文）

資本家的心比虎狼还狠毒

惠生 野林 素珍 立仁

这里記述的，是安徽省蕪湖裕中紗厂（蕪湖紡織厂的前身）的資本家对养成工剝削和压迫的血腥事实。

养成工进厂前后

裕中紗厂的起家史，就是一部浸滿工人血泪的历史。这个厂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一年間，資本家招收的童工（包括养成工）曾經达到了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童工和成年工人一样，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时以上，但却沒有工資可得，沒有人身自由。

資本家对养成工的剝削是极其殘酷的。在大批廉价劳动力的面前，資本家規定了异常苛刻的挑选条件，像买商品一样地去挑选所需要的劳力。这些条件如：

人品：端正，未婚，能吃苦耐劳。

体格：强壮，活泼，无传染病。

年岁、体重：清、鋼、条、粗、搖紗（指各道生产过程）——十八至二十五岁，体重九十磅以上，不得超过一百二十磅；細紗、筒子——十四至二十五岁，体重八十磅以上。

这些被挑选的年輕姑娘进厂后，殘酷的剝削便对她們开始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王桂英这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和她

的同伴們从浙江諸暨县被驅进工厂的时候，持枪的厂警就像对待犯人一样搜查她們，監視她們，把她們量了又量，称了又称，最后要她們在一张写着密密麻麻字迹的合同上画押，捺指印。誰知这指印一捺，她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姑娘們被关在几間潮湿、低矮的草房里。她們被驅来給資本家卖命，开始了奴隶般的屈辱生活。姑娘們都伤心地哭了，她們吵着要回去。資本家說：“不滿三年，誰想飞也不行！”

她們被逼着上班去了。那时候，厂里只分两班生产，每班要做十二个小时。上班时都是被赶进去，然后鎖上大門。动作稍一緩慢，被工头看見了，不是拳打，就是脚踢。做夜班时，晚上七点钟被赶进車間，早上五点钟被赶出来，有时出了車間連飯也不給吃，就赶回宿舍，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能放出来吃餐飯（对做夜班白天休息的工人，資本家中午不供应飯），在那段长時間里，人餓得就像要窒息一样。厨房里的師傅們看見她們餓得可怜，就偷偷地送点鍋巴給她們吃，后来被看守发现了，資本家就加訂了一条罰律，在宿舍里查到一块鍋巴罰五角，大的罰八角。并且严格禁止廚師再送鍋巴进去。这样，她們只好天天挨餓了。

工人們睡的床鋪板里的臭虫能下把抓，她們只好睡在地板上，这又触怒了資本家。一天夜里，工人們刚刚睡去，賬房先生不問青紅皂白，把工人一个个踢起来，有的头上被踢了一个包，有的身上踢青了一片，他們还要查問，“是誰带头睡地板的？不讲就罰錢！”

资本家的心比虎狼还狠毒

养成工进厂后，第一件大事是学接头。学这个活足足得站一个星期。一天十二个钟头站下来，甚至连头都不准乱动一下，年轻的姑娘双腿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亮光光的，有的疼得哭，有的疼得叫。老工人汪兰英，进厂已经三十多年了，她现在是细纱工段工段长，当她回忆起当养成工那段生活，依然毛骨悚然。

那时，养成工一上班就提心吊胆，偏偏烂粗纱多，断头多，一到这个时候，倥官走过来，先是一个耳光子，跟着又是一巴掌，把人推的老远。有的人经不住这一推，一直跌倒在纱管上，碰破了头，鲜血往外冒；没有跌倒的人，还得赶快走过来，继续接头。

学会了接头，可以上车了，但工头却把坏车给她们推，把烂粗纱分给她们做，活做得稍微差了一点，“拿摩温”、倥官就劈脸打来了。

养成工虽说都是年纪轻轻的姑娘，但在那残酷的剥削下，有的被折磨得神智恍惚，在机器面前被轧伤了；有的中暑死了。弄堂里几乎天天都有哭声。

汪兰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悲惨事情：有一年夏天，弄堂里有一个养成工叫头痛，“拿摩温”在弄堂里串来串去，怎么也不理睬她。她站着站着，脸色苍白，嘴冒凉气，便一头栽在地上。等到来人把她从车间拖到院子里的时候，她就断气了。还有一次，有一个叫“小贤子”的养成工，低下头去拿落在地上的筒管，不留意把辫子给绞到细纱滚筒上。她那震心的惨叫，那扯破的头皮流出来的鲜血，使整个车间里的

工人都为之震惊，许多人哭了。等到把她从机子上拖下来时，她已经紧紧地闭住了双眼。这时，赶到现场来的资本家却钻到车肚子里看机器，庆幸地说：“还好，总算机器没有砸坏！”工人们指责资本家不讲道德，要求安全的劳动条件。但是，拥有两万两银子的资本家刘晦之却恬不知耻地说：“生意人不讲道德。”他们不顾工人死活，一点劳保设施都没有。

禁律、罰款多如麻

当时的养成工，有本埠和外埠之别。本埠的，进厂一年半时间，是白为资本家干活；外埠的，每天有二角钱津贴，除去伙食费一角五分，每天只能挣得五分钱。工资微薄到如此程度，但资本家仍不放过她们，以种种理由，订出十分苛刻的禁律，对养成工实行“七罚”和“八扣”。资本家究竟怎样来罚扣工人呢？请先看看他们的禁律吧：

- 一、不尊敬职员，扣五分；
- 二、走路吃饭，扣二角；
- 三、上班打瞌睡，扣半个工；
- 四、上班开玩笑，扣二角；
- 五、抢一支粗纱，扣二角；
- 六、纱头绞光了，扣半个工；
- 七、筒管丢在地下，扣二角；
- 八、在宿舍地板上睡觉，扣五分。

另订的七条体罚是：一、打手心；二、抓眼皮；三、扭耳朵；四、顶筒管；五、托粗纱罚站；六、用棍子打；七、开除（这是最厉害的一条）。

资本家就是靠着用皮鞭和饥饿的办法，来维持着他们对

工人的殘酷剝削。當年進廠的養成工，誰沒嘗過這分苦頭，沒受過這分怨氣？落紗工人、共產黨員金寶清還清楚記得她進廠當養成工的一樁事：有一天，她操作的弄堂口出現了一隻壞粗紗，“拿摩溫”看見後，硬說是她搶壞的，立刻就抓著她的頭髮，把這隻壞粗紗頂在她的頭上，硬逼著她去“游街示眾”。小小的金寶清有口難辯，被拉著從細紗間一直游到筒搖間。她氣得哭，和她一道來的姐妹們也氣得哭。

對於養成工來說，最擔心的就是怕罰錢，怕開除，怕挨餓。而資本家最喜歡這幾條罰律，動輒以此來懲辦工人，有的養成工就因罰錢太多而弄得沒有飯吃。王桂英這個從農村來的小姑娘，因為看不慣“拿摩溫”凶惡地欺凌工人，而經常被加以莫須有的罪名，今天罰二角，明天又扣半個工，最後把她的伙食津貼費都罰掉了，資本家連飯也不給她吃，她只得寫信向家里要錢。那年頭，農村的生活更苦，家里哪有錢寄給她，她的父母也不知淌了多少淚水，最後變賣了家里僅有的一點衣物，才給她寄了幾塊錢，養活了她的的小命。還有一個叫湯德珍的養成工，一天，她和一个工人開了一句玩笑，誰知被雙領班“駱豬頭”（駱純范）看見了，立刻被趕出車間。工人們眼看小湯要餓飯了，一個個出來講情，駱豬頭毫不理睬，還是把她攆走了。

多少工人被迫喪命

剛進廠來的養成工，都是些身強力壯，手快、腳快、眼快的姑娘，但是，經過長年累月的殘酷折磨，一個個都變成面黃如土、骨瘦如柴的人，有的甚至病倒了。有一天，養成工張雅芬生病發燒，渾身滾燙，在車間里實在支持不下去了，

就偷偷地跑回宿舍里休息，誰知領班知道了，抓住头发把她拖起来，照脸就是几个耳光，嘴里还罵着“懶貨”。张雅芬头昏目眩，眼前直閃金星，只好拖着带病的身体又去上班。打这以后，养成工生了病再也不敢到宿舍里去了。有时实在支持不住，只好钻进臭厕所里，或者钻进装棉絮的筒管箱里休息一陣。有的在不透气的箱子里面蹲着，为了避免看守婆川流不息的搜查，不敢出来，等到下班后大伙儿把她拖出来的时候，有的已經被悶得脸上发紫，有的被悶得渾身是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有的被悶得病情更严重了。

裕中紗厂从开厂到解放，先后轉了六个資本家的手。虽然資本家不断更換，但对养成工的剝削却都是一样的。他們可以对养成工任意解雇，而养成工想要离厂却不行。一九四五年进厂的养成工中，有一个瘦高个儿、两只大眼、精神抖擞的姑娘，叫陈淑嫻。她进厂不久，由于日日夜夜在清花車間做拼花，得不到适当休息，車間里飞尘和飞花又多，漸漸地染上了肺病。这时，資本家不仅不給她医治，也不准她休息。工人們看見她身子越来越支持不住，要求給她換个輕的工作，但一直得不到答复。就这样，陈淑嫻的病一拖再拖，天天咳血，几次昏倒在車間里，实在不能再工作了。工人們看見这种情况，非常气愤，再次要求让她回家休养，資本家却瞪眼吹胡子地說：“沒这么便宜，三年合同是她自己按的手印！”

陈淑嫻在資本家的殘酷压榨下，終于爬不起床。工人們要把她抬到医院去，还没等进到医院就断气了。

陈淑嫻的命运，是旧社会里受压迫人民的共同命运。她含恨而死。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陈淑嫻渴望的幸福生

活终于实现了。当年和她一起进厂的养成工，有的已经创造了最新的生产纪录，有的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领导一个工段的生产。在这批养成工中，还有的被选为劳动模范，到过北京，见过刘主席。全厂拥有十万纱锭的机车在高歌，那音律伴着纺织工人心坎里的激情，歌唱着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

徒工血泪

王信敏

一进入青島华新紡織染厂的大門口，就是一处极为美丽的花园。誰能想到，就是这座花园，在解放前，却是一处阴森森的“艺徒”坟地啊！当我们在这个花园里休息的时候，老工人们向我们介绍了过去徒工的血泪生涯。

誘騙招工

一九二一年夏季，連着下了四十多天大雨。滾滾的黄河水，冲垮了年久失修的堤壩，淹沒了黄河岸边利津、沾化等地的无数村庄。上万頃良田，变成一片汪洋。

就在这年秋天，正当大批灾民走投无路的时候，华新紡織染厂的老板們派出大批爪牙，来到灾区，勾結当地官府大量招收“艺徒”。招工布告上写着：艺徒进厂以后，半天做工半天上学，管吃管穿，吃大米洋面，穿洋布新衣，住瓦房洋楼。每七天一休假，休假日可以自由玩耍。每月工資五块“大头”。一年出徒。出徒后按技术定級，工資最少三十块“大头”……

陷于絕境的灾民們，对招工布告上說的这些，虽然半信半疑，但是，看看眼前缺吃少穿，不得不含着眼泪，把自己的亲人送給招工賊。

华新紡織染厂的資本家就这样趁火打劫，用欺騙的手

段在广大的灾区招收了一千二百个最大才十来岁的小徒工。

艺徒——囚徒

这一千二百多名小徒工被老板用馬籠車一批批地运到了青島，又被厂警用刺刀押进了工厂。进厂以后，他們身上穿的破衣烂衫被扒去烧了，换上了厂里专门用花包布做成的黑衣服，袖口上鑲着一道蓝杠。徒工們穿上这种衣服就象犯人穿上了囚服，行动就不自由了。

徒工們住的不是什么洋楼，而是两排十六幢平房，四周用紅磚砌起的围墙有两丈多高，上面围着铁蒺藜；大門口，一边站一个背匣枪、戴大盖帽的“号丁”。房子都是一个式样，后墙上开了几个只有三块磚大的小窗，窗上釘着几根粗铁棍。前墙一头开一个小門。紧靠前后墙，用土坯搭起两排通鋪。两排鋪上要住八十多个人，晚上睡下一个紧挨一个，連翻个身都不行。这哪里是宿舍，簡直是座牢房。

一到数九寒天，每个徒工只能从資本家那儿領一床用包花布和落脚棉做的小薄被子。有盖的沒鋪的，到了夜里孩子們都冻得睡不着觉。有一次一个叫刘守的徒工，夜里冻得起来坐着，嗚嗚咽咽地哭爹喚娘；“看号司”听見了，进去抓住小刘的头就往墙上撞，一連撞了五、六下，接着連吵带罵的又将刘守的被子甩到院子里。从此以后，夜里再冷也沒人敢放声了。

到了夏天，屋子里人多，一进去就象进了蒸籠一样。屋內的蚊子、跳蚤多如牛毛。徒工們个个都长了滿身的濃泡疥疮。更殘酷的是，老板怕夜里有人乘上厕所大小便跑掉，便索性将便桶都放在屋里，門上加上大鎖。徒工們大小便都在

屋內，弄得滿屋子又臊又臭。有天夜里，一个叫呂正田的起來小便，一不小心碰倒了尿罐，尿流了滿地。呂正田真忍不住了，便罵道：“他媽的，拉屎尿尿都管起來了。”罵聲沒完，門上的鎖嘩啦一聲開了，闖進來一群“看號司”，一頓鞭子，當場把呂正田打得昏了過去。呂正田被打以後，一直躺了二十幾天才慢慢能動彈，腿上卻留下了一片片傷疤。

徒工們每月的工資不是五塊“大頭”，而是三角錢。就是這微不足道的三角錢，也不頂三角錢用。資本家真是雞腕眼里算出米粒來，他在廠里開設了一處所謂“福利”商店，賣的日用百貨都比外面貴几成。工人的工資每月不是發現洋，而是發給只能在他們開的商店里才好用的“華新票”。這樣一來，每個徒工只好眼睜睜地叫資本家再剝去一層皮。

徒工們吃的不是大米、洋面，而是些發了霉的雜糧面餅子。餅子里有草，有麻袋毛，還有砂子、蟲子。到了吃飯時間，把頭便將一筐筐壞餅子抬進車間，每人分兩個，一邊干活，一邊吃。那時車間里沒有吸棉設備和噴霧設備，花毛飛滿車間。有的小徒工把餅子放在車頭上，巡回一趟咬一口，不等咬上几口，餅子都成了棉花團團了。不少人因此得了病。進廠不到三個月，這些天真可愛的孩子，就被折磨得面黃肌瘦。

不但飯吃不飽，干了一天活，連口水也撈不着喝。徒工們渴極了，只好偷偷到開水鍋里去舀點水喝。不知有多少人，因喝水挨過打；有的甚至送了命。有個叫尹之清的小徒工，因為頭天晚上瀉肚子，第二天勉強支持着上了班，干了一會活，便覺得口渴，嗓子眼里直冒煙，趁把頭不在，就拿着碗去舀水。他拖着病身子，費了好大勁才到水鍋跟前。這

时，鍋子里的水已經被蒸气烧的滾开了，正冒着热气。小尹刚想探身舀水，只觉眼前发黑，一头就栽进了开水鍋里。只听一声狂叫，徒工們迅速赶来把他拉出。哪知小尹疼痛难忍，奔跑了十几步就栽倒咽气了。

狠心的老板，不仅夺去了徒工在厂內的自由，就連千里以外的亲人也被隔絕了。他們規定在徒工出徒以前，一律禁止徒工家屬探訪。可怜的孩子們，长年离开家乡和父母，加上在厂內遭受苦难，越发想念自己的亲人。而家乡的亲人更是想念自己的孩子。不知有多少父母为儿子哭断了肝腸，气瞎了眼睛。有一个叫王金堂的徒工，从他离乡后，父亲就染病不起，因无錢医治而死去了。他母亲埋葬了老伴，帶着小女儿，沿路討飯，来找儿子。在半路上小女儿又餓死了。这位母亲用眼泪埋葬了女儿的尸体，忍着悲痛，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了一百多天，好歹打听来到了华新紡織染厂。老人含着喜悅的眼泪，向厂警打听儿子的情况，希望馬上能看見自己想念已久的儿子。可是，这狼心狗肺的厂警不理睬她，不让她进去。任凭老人怎样央求，也沒有打动厂警的铁石心腸，反而大怒道：“你的儿子早已死了！”老人一听，信以为真，她一下子昏倒在地。苏醒过来后，口里不住地叫着儿子的名字，一头撞死在华新紡織染厂的大铁門上。这位飽受旧社会苦难的母亲，用自己的死，向那吃人的旧社会作了最后的控訴。

残酷迫害

徒工們在衣、食、住、行上所受的虐待，已經够凄慘的了。资本家、把头还任意殘害那些他們认为违犯厂規的徒工。

皮鞭、大板、班房，天天陪伴着他們。这些无辜的孩子，有的被折磨成殘廢，有的被害身死。細紗車間有个叫曲有的小徒工，扫地时不小心，碰了一下陈領班的褲角，當場被这个姓陈的狠狠踢了一脚。瘦小的曲有被踢在車底下，碰得头破血流，半天沒喘上气来。从那以后，曲有成了殘廢，整天弯着腰在車間扫地，沒活几年就死去了。徒工戴安乐，有一次不小心搖坏了一点点紗，就被罰在車間的洋灰地上跪了四个多钟头，两个膝盖都跪肿了。

徒工們在如狼似虎的領班們眼前，哪能說个“不”字。有一天，一个叫呂嘉林的徒工，干活时和一个領班頂了一句嘴，除了當場被領班抽了一頓鞭子外，还被罰干連班（一連干二十四小时）。呂嘉林干到二十多个小时，实在支撐不住了，身子一歪，正碰到皮带上，霎时被皮带卷到天軸上甩死了。全車間的徒工看見呂嘉林的慘死，都情不自禁地嚎啕痛哭。領班发现停了車，过去一看，一声冷笑，捂着鼻子就走了。

徒工們受不了这般非人的虐待，便千方百計地想法逃出虎口。有一天下大雨，从宿舍被押解到工厂去上工的徒工，趁机逃走了七十多个。可是王德成和张龙两个小徒工，沒跑得掉，被抓了回来。資本家为了杀一儆百，把全体徒工都召集在一起，當場把他两人倒剪双手吊了起来，用皮鞭、軍棍打的死去活来。打完后，資本家恶狠狠地对全体徒工說：“今后誰再逃跑，抓回来格杀勿論！”厂警們打完了，揚长而去。徒工們把奄奄一息的王德成和张龙抬回了宿舍，只見俩人都成了血人，渾身血肉模糊。大伙費了半天功夫，才把他俩人身上的血迹洗干净。过了不到一天，他俩都先后死去了。

“潘蝎子”治病

饥饿、劳累、皮鞭，夺去了徒工的健康，生病的人一天多起来了。资本家玩弄假慈悲，从外边弄来一个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潘月锄，给徒工们看病。这家伙拿着比徒工高五十倍的工资，整天握着脚指丫，一见到看病的，就皱起眉头骂道：“又长猪瘟啦！给我滚过来。”说着胡乱一摸，顺手甩给包早已准备好的药，不少有病的孩子，吃了他的药，病越发重了；有的甚至被毒死。大伙气的都叫他“潘蝎子”。有个徒工叫黄延福，第一天发烧，找“潘蝎子”看了看，弄了服药吃，结果第二天病的不能动弹，第三天便死了。死的时候两眼大睁，遍身发青，鼻子、口里淌血，很明显是吃药中毒而死。从此，徒工们有了病，宁肯死挨死等，也不找“潘蝎子”看。这样一来，正合了资本家的心意，不求医生就不是真病，就得干活。因此，很多得了重病的徒工，仍被监工的鞭子逼进车间，咬牙强干，勉强支持。有的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在车间，便人事不省了。

一到夏天，由于生活条件低劣，徒工们很容易染上传染病。有时一场流行病，便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资本家美其名设了一个“休养间”。徒工一有了病就被抬进休养间隔离起来。哪知休养间，实际上是一个“停尸房”、“活杀场”。只要进了休养间的门，就别想活着出去。每隔两天开一次门，往外抬死尸。每次总要抬出去几个死尸。更残忍的是，有的徒工还没有死，就被放进薄皮棺材，活活埋掉。现在的李师傅还清楚地记得：和他同乡的一个叫刘士和的生了传染病，还没死，就被硬装进了棺材。往里装的时候，他还摇摆着手，

喉嚨里還有微弱的“哼哼”聲，鼻孔里還有熱氣。可是殘忍成性的資本家，哪還管你這徒工的生命呢？

在毫無人性的資本家的剝削、壓榨、折磨下，一千二百多名徒工，不到三年時間，就死了三百九十多人。現在青島華新紡織染廠的辦公樓前的花園，那時是一塊荒地，徒工死了就埋在這裏，小墳堆一個接着一個。

在徒工的白骨上，資本家卻大發橫財，又建立了一座座新廠房。

南洋烟厂工人的仇恨

赵元宽 江南

武汉南洋烟厂，是一个有三十八年历史的老厂。最先，它是一个民族资本家所创办的一家企业；从一九三七年起，为宋子文的官僚资本所控制；抗日战争时期，又一度为日本商人霸占。解放前，南洋烟厂的工人，身受资本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让我们看看当年旧南洋烟厂工人的苦难吧！

卖身契生死牌 开除容易入厂难

解放前，南洋烟厂的资本家雇佣工人时，先要订契约（工人称为“卖身契”），工人入厂时还得填联保单，写保证书。厂方规定：按月拿工资的月工，进厂“须有可靠介绍人，并须有殷实保证人”。当时的工人，大部分是一九三一年湖北大水受灾时，从农村到汉口逃荒的贫苦农民。他们哪里攀得上这样的介绍人和保证人呢？提起这，老工人说：“过去做工为资本家卖命，还得求爷爷告奶奶，不托人不送礼，空着一双巴掌是莫想进去的！”老工人周金枝，给头佬（工头）送了十块银洋，才得到一块厂方发的“工牌”，工人进厂做工，就凭这块牌，资本家把牌子收掉，就是开除。因此，工人称它为“生死牌”。陈金云入南洋烟厂时，人上托人，给介绍人送了两瓶酒，一只大肥鸡，才进了厂。工人们为了给头佬买这些

东西，借债、典当，好容易入了厂，可是资本家和头佬随时可以把你开除。他们规定：“不守厂规”开除；“疏忽产品”开除；“工作不力”开除；“车间喧嘩”、“因病不能工作”、“生了毛毛，三天不上班”，也开除。资本家开除工人的名目，多得举不胜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九三六年，工人李巧姑有一天包的烟里，只有一盒包了十九支，就被厂长陈容贵开除了。一九四二年，周金枝和她的爱人湯良相都在厂做工，有一天，湯良相被小盒机轧断了一个指头，不能上工，于是日本人把周金枝也找去，说：“你男人的不能做工，你的也不做了！”周金枝夫妇就一起被开除了。每年四月到八月，这是烟厂生产淡季。周金枝说：“那时我们包烟部，旺季要是有一百人的话，淡季最多只留一半。在旧社会做工，一脚在門里，一脚在門外，根本没有保障。”

在旧社会，工人就这样经常遭受失业的痛苦！

望魂台巡夜钟 压榨剥削数不清

这个厂开工时资本家訂的厂规上规定：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在这十小时之内，工人得拚命地干，资本家訂了一套规则，一套制度，一套办法，养了一班人马，专门束縛和监视工人。

厂规洋洋四十条。第十三条规定：“每天开工，……过十五分钟以外者，作为缺工不给工资。”第十五条规定得更是苛刻：“擅离职守，罰扣工资四角；迟到曠工，罰扣工资二角；疏忽出品，罰扣工资六角；瞌睡坐臥，罰扣工资二角；……”

厂方为了暗中监视工人，在车间专门修了一个“暗楼”。有一次厂方的陈容贵在暗楼里看到一个姓童的工人提前几分钟

去洗澡，他就把这个工人开除了。工人称这个暗楼为“望魂台”。

资本家要工人巡夜，又怕工人不按时，特制了一口钟，钟里有一个打字机一样的装置，里面有“一”到“十二”的字模，外有十二把钥匙，管十二个钟头。如到十二点，把十二号钥匙套进去，它能在钟里的纸上打上“十二”。去晚了打不上，去早了也打不上。这十二把钥匙分放在十二个地方。第二天，资本家把钟里的纸条拿出一看，就知道工人晚上有没有巡到他所指定的地方。

工人大小便，工头拿着表，计算时间，看你蹲了多久。如果他认为你蹲久了，你就要挨骂。

在这个烟厂做工的工人，一天要进行十个小时的紧张劳动，下工后一个个精疲力竭。日子一长，有的劳累而死，有的因劳成疾。资本家为了赚钱，还把许多应该由男工担任的活用女工和童工代替，并且厂方规定童工也要做夜班。一九三七年，有个叫罗炳阳的童工，连做了几个月夜班，结果累得吐血而死。

工人工时长，工资却很低。一九三五年的“雇工契约”上载明“按月付给薪洋十二元正，伙食由受雇人自给。”其实，一个月十二元的工资，也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各种各样的罚款，淡季做几天，歇几天，工人经常陷于半失业状态，所以工人的工资实际大大低于纸面上的这个数字。一九三五年资本家的“厂务报告表”上载明：全年工人总数是四百七十二人，工人总工资三万六千三百二十四元四角一分，平均每人每月工资只有六元四角。可是，那时厂长每月的工资是四百五十元，高于工人几十倍！

一九三八年以后，物价节节上涨，工人这点微薄的工资，

更不值錢。一九四四年，工人苏菊英，領了半个月工資，下班去买米，米店关了門。过了一晚，第二天米价飞涨，半个月的工資只能买四根油条。

工人生命如粪草 伤病生死无人問

解放前工人因工受了伤，得了病，資本家根本不管。老工人說：“我們的命，在資本家眼里，还抵不上一根草！”

現在退休老女工楊鎮的爱人楊明汉，一九四六年三月入厂，担任打坏烟的工作。那时，什么劳动防护設備也沒有，烟灰吸进肺里，不久得了肺病。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肺病一天天严重起来，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厂里不发工資，楊明汉无法，只得带病上班，这样拖到腊月，就臥床不起，死在家里。楊鎮一早去找工务課长黄发枝借錢，黄发枝說她去早了。第二次再去，黄发枝又說她去晚了。楊鎮几次向黄发枝哀求，才借到一点錢，但連还楊明汉生前欠下的药費还不够。最后，楊鎮还是在工人姊妹的关心下，大家湊了些錢，帮助她把丈夫埋葬了。

一九四八年冬天，工人韦賢元，給厂里卸烟时胸部被打伤。他当时要求厂里請医生給他检查，厂里不肯。过了一个月，胸部疼痛一天比一天厉害。韦賢元的爱人去找陈容貴打证明上医院，陈容貴說：“別人都搬得滿好，他不小小心，跌伤了怪誰？”后来，厂方在工人压力下，才給韦賢元开了个上医院检查的证明。工人冒着雨，抬着韦賢元，連跑了三个医院，医生检查后都不收，說：“肺都烂了一半，还治什么！”又过了半个月，韦賢元就死了。

工人死了无人管，厂主簡家的人要死了，那就鬧翻了天。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簡仲舉在許昌車站被人綁架打死了，簡家從上海拍來電報，一再囑咐要“從豐殯殮，以慰逝者”。漢口分公司“遴選干員”（即能干人員）多次到許昌料理。簡仲舉的屍體，派專人由漢口運到上海，轉運到廣州，不知花了多少費用。僅為了捉拿凶手，簡家送給偽國民黨軍政機關酬賞費就達四千元之巨。

閻王樹黑水牢 毒刑不下白公館

解放前南洋煙廠的工人在政治上所受的侮辱和迫害，真是駭人聽聞的。

從開工第一天，資本家就把工人當小偷，出門要搜身，這是對工人、特別是對女工的一種侮辱。有個姓李的女工，來了月經，在門口搜身的狗腿子硬說她下身藏了東西，要她拿出來檢查。經過鬥爭，最後還是把她拉到廁所，給這些狗東西看了，才罷！

特務、憲兵、頭佬打罵工人，那是常事！

日本人經營南洋煙廠時期，這種壓迫，達到了頂點，真不下於“中美合作所”里的白公館！

一九四〇年七月，鍋爐房的拖煤工人王明陽，下工回家在門口吃飯，因地面潮濕，就找了一條麻袋墊上。那是熱天，吃罷飯，涼風一吹，過度疲勞，就睡過去了。突然，他覺得有人打他，睜眼一看，兩個日本憲兵凶狠地站在他前面，接着把他綁起來，帶到工廠附近日本的馬棚里，把他捆在大樹上。出來進去的日本憲兵，左一耳光，右一耳光，打得王明陽頭青眼腫，幾次昏了過去。第二天，又把他送到憲兵隊，憲兵隊隊長問：“麻袋的，你明不明白？”又問：“昨天，

这麻袋装的东西，你的偷了偷了的！”就为了这条麻袋，日本宪兵端来一架五步的梯子，从背后套在王明阳的脖子上，然后站在梯子上，用马刀的背，朝他头上砍。王明阳当即就被砍昏了。这帮野兽又用香烟火放在王明阳的额角上，把他烧醒。以后，更惨的事发生了：日本宪兵提来半桶盐水，用气筒打进王明阳的肚里，等到他的肚子涨得像鼓一样的时候，又在他的肚子上乱踩，盐水又从他口里、鼻子里倒流出来。王明阳又昏了过去。最后，这群野兽把他丢进了附近的一个“黑水牢”里。“黑水牢”的水又臭又黑，水面上的蚊子成群，他在这里关了七天六夜。后来，他的爱人花了三十块现洋，才把他救了出来。

现在，工厂锅炉房外，有个水泥池，这就是当年的“黑水牢”！厂门前的大柳树，人们叫它“閻王树”，日本鬼子经常在这里吊打工人，崔俭保就是在这棵树上被吊打死的。

此伏彼起的斗争

剥削、压榨、侮辱、迫害，这种苦难的生活，在工人们的心里埋下了对资本家的刻骨仇恨！工人面前只有一条路——斗争。解放前的二十五年里，南洋烟厂工人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

早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女工张陈氏等五人就起来进行斗争。同年七月，工人发觉厂方要把工厂迁往重庆，阴谋把汉口工人扔下，置之不顾。从孤儿院来的一批工人，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斗争，并且选出自己的代表，出面和厂方陈容贵交涉，要求先发遣散费。这两次斗争，由于没有把全厂工人发动起来，再加上旧政府特务连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结果失

敗了。但是，斗爭却一直在繼續。

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南洋烟厂的六年里，不管敌人多凶恶，也扑不灭工人斗爭的火焰。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誣賴一个姓黄的工人偷了东西，把他捆在树上，正要下毒手，被楼上的女工看到了，她們把工具一敲，停了工。楼下的男工，涌出車間，把鬼子围住，工人人多势众，鬼子沒有办法，只得把这个姓黄的工人解开放下。

抗日胜利后，在一九四七年，南洋烟厂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組織，又在党領導的全市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南洋烟厂的工人斗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斗爭越来越頻繁，規模也越来越大，而且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一九四八年元月，正当春节，陈容貴和厂里的高級职员大肉大魚正准备过节。工人呢，一个月的工資，还买不到三斗米。当时工人提出要增加工資，厂方不同意，工人立即罢工。罢工一开始，就切断了对外的电话綫，包围厂部的办公室和陈容貴的宿舍，拆掉了他們的炉子，断了他們的炊。他們用电炉做飯，工人又把电綫切断了。工人还向社会各界发出通电，上街开展宣传，爭取各方同情。陈容貴被围得沒有办法，偷偷打发佣人出来买烧餅，又被守門的工人截住了。

最后厂方才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

以后，还接連不断地发动了要求加发生活補助費、发遣散費的斗爭，这些斗爭，都席卷全厂，取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五月，工人以护厂斗爭的胜利迎接了武汉的解放。

今日烟厂蒸蒸日上

解放后，南洋烟厂成了人民的企业。

工人，过去是资本家的奴隶，现在是国家的主人！

过去的“黑水牢”，现在是工人洗澡的温水池！

过去的“阎王树”、“望魂台”，现在是工人忆苦思甜、增干劲、励斗志的好教材！

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飞跃发展起来。标志着生产发展的箭头笔直上升，生产数字，成倍地增长。以一九五〇年为一〇〇，和一九六三年比较，一九六三年总产值是四六〇，总产量是五一二，工人劳动生产率是三一九。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烟丝车间，过去这里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女工撕烟梗，一个个手上打得全是泡；现在有了抽梗机来代替。在卷烟车间，过去一箱箱的烟丝，五十斤重，全靠人扛；现在有了风力上丝机来代替。在包烟车间，过去用手工包，手工糊；现在，有了包烟机，这边一支支的散烟进去，那边就流出一盒盒包好的香烟。工人体力劳动大大减轻，劳动条件有很大改善。过去车间里烟屑飞扬，像雾一样，空气污浊，工人吐出的痰也是黄的，许多人得了肺病；现在车间里都有通风管道、排风扇，不断为车间更换空气，工人一个个都很健康。冬季，车间还有暖气设备，暖气达不到的地方，都生火炉。工人说：“党关心我们，我们就要时时刻刻想着生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老工人周金枝说：“现在如果不好好生产，就配不上我们工人阶级的称号，就不配当国家的主人！”

除了生产，老工人关心的另一件大事是：如何教育下一代。过去受过日本人毒刑的王明阳，现在退休了。他谈起解放后，厂里出钱为他医治在旧社会得的一身病，四次送他疗养时说：“要不是解放，我这把骨头，不知烂在哪里了。”接着

又說：“我現在退休了，只有教育好我的孩子，要他們聽黨的話，好好工作。”前不久，他把家史講給讀中學的二兒子聽，並要他整理出來給他大哥寄去。王明阻說：“我們不能因為有了今天，忘了過去！”

吃人的洋行

天津土产一厂写作小组

“桃仁工”，是加工核桃、桃仁、杏仁的工人。在旧社会，加工桃仁的工人，也是备受压迫的。他们在大小封建把头、中国买办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压榨下，受尽了苦难。

洋行吃人胜过狼

一提起洋行，人们一定会想到这是解放前洋人在中国开办的贸易行。其实，不仅是洋人，其中还有中国的买办资本家。他们互相勾结，把持着旧中国的对外贸易，残酷地剥削中国劳动人民。解放前，天津知名的洋行有老联昌、海外、吉义、隆茂、李和、志通、安利、永兴等好几十个。在这些洋行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以及他们豢养的大批打手、把头、流氓、恶棍，对待工人象豺狼吃人一样，甚至比豺狼还凶狠。老桃仁工人都说：“吃人的狼好提防，吃人的洋行不好防。进了洋行便遭殃，吸了你的血，断了你的肠。”

这些洋行是怎样剥削桃仁工人的呢？

第一个手法是“包工”。每个洋行里都有洋棧房和华棧房。洋棧房是帝国主义者掌握对外贸易的；华棧房是中国买办资本家专为外国资本家雇工进行商品加工的。外国资本家对外成交桃仁，中国的买办资本家就通过其打手、把头招雇工人加工桃仁。所谓“包工”，老工人介绍说：洋行资本家的

桃仁加工活，实行日工資，他們需要一千工人做的活，只雇五百工人或更少的工人。为按时完成加工任务，就无限加大工人劳动强度或延长工时。干完活后，資本家表面上把工人应得工資发給工人，实际上經過資本家、大工头、小工头、打手的层层克扣，工人拿到的工資仅是应得工資的几十分之一。一天还混不到两斤混合面。如果誰得罪了工头，还要給你加上个罪名，再延长五、六个小时的劳动時間。所以，有許多工人經常一干就到深夜二、三点钟，而工資一文不給。

第二个手法是“包活”。华棧房的資本家向洋棧房包来活以后，压价包給工头，工头們又再压价包給工人。老工人何玉珍說：“那时，資本家包給工头二百斤桃仁，只給一百个銅子，这对工人剝削就够狠的了。可是，再經過大工头、小工头，包到工人手里，苦干一天，只能落得二、三十个銅子。当时，棒子面二十来个銅子一斤。一天掙的錢，怎能够我一家大小五张嘴吃！”

第三个手法是“压磅”。层层剝削，仍滿足不了資本家、大工头、小工头等吸血鬼，他們还用压磅的办法榨取工人。所謂“压磅”，就是小秤包給工人，資本家大秤收回。明明工人一天干了二百斤活，誰知一上磅，还不到一百斤。說你“干活少”，給銅子也少了。工人那时常說：“資本家，坏良心，一磅千斤重，活活压死人。”

第四个手法是資本家說的“由爷賞”。資本家貪得无厌，剝削工人无孔不入。工人能不能吃上一碗飯，还得看关錢这一关。工人們叫它“生死关”。一到关錢的日子，資本家賬房里的狗腿子，端一板子銅子出来。工人們焦急地等着，都敞开一个破兜子，狗腿子抓一把銅子向工人猛地投过来，嘩啦

一声，不論你一天干多少工，兜子里落几个是几个。掉在地上的銅子不准拣，那就算入了狗腿子的腰包了。有不少工人接不到銅子，只好空着兜子回家。

另外，对工人，特别是对女工进行額外剝削。工头們看女工不順眼，或是嫌女工长得不漂亮，就无事生非，刁难她們，干完活后，无故少給錢。每逢年节，工人連飯都沒得吃，还得千方百計地給工头送肉、鸡、点心之类。哪个工人不送，工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借口开除你。开除后，工人的生活就更无着了。

一座人間活地獄

“油包队，活受罪，白天吃不飽，黑夜不得睡。地獄生活熬不尽，流不完的血和泪。”这是旧社会桃仁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搶牌喪命：旧社会的桃仁工，干活有季节性。一般說夏秋两季沒有活干，他們到处流浪，吃穿无着。每逢十冬腊月，是桃仁加工季节，失业工人多，都要爭当桃仁工，資本家就采取“撒牌”的办法招收工人。誰要搶到一个牌，才能为資本家卖命，弄碗飯吃。为了搶牌，失业工人每天二三点钟就起床，赶到洋行門口等着。刺骨的寒风紧紧吹，鹅毛大雪紛紛飞。洋行的大門死死关着，工人們等啊，等啊！好容易挨过三四个钟头，狗腿子才来开門。門一开，劈头就是一頓罵：“这群‘臭油包’，誰叫你們来这么早？搅乱老爷睡觉！”資本家撒牌，願撒哪撒哪，在馬路上、大門口、樓上的加工房里。有个严冬早晨，資本家把工人赶到樓上搶牌，他們却从樓上往樓下撒，往樓窗上撒。一个工人在三樓窗口搶牌，不幸摔下

来，一片鮮血淋漓，我們的階級弟兄摔死了！当几个工人含泪去抬走尸体时，資本家在楼上罵道：“他命薄自找，該死！”慘无人道的資本家，視我們工人的命如糞土。他們經常这样夺走工人弟兄的生命！

“保路”關王：一天早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沒搶上牌，嗚咽啼哭，因一家人要指望他吃飯的呀！一位老工人看到很伤心，自己豁着挨餓，便把搶来的一个牌送給了小伙伴。小伙伴拿了牌刚进洋行大門，工头一見就怒气冲冲地說：“你这个小不点，能干活嗎？給我滾！”說着，就把孩子推出門外。但是，僥幸进了加工房的又怎样呢？工头的唾沫、鼻涕、辱罵、毒打会随时飞来。特別当“保路”洋人驗活时，工人們屏着呼吸，耐着心跳，只見工头象看家狗一样，向他們的主子献殷勤。王福海說：一次，他身上很痒，用手抓了一下，工头走过来就是一个巴掌，又是唾沫唾，又是用核桃打。不仅如此，“保路”不走，工人們連廁所都不能去，逼得不少工人尿了褲子。“保路”驗活时，若說一声：“欧来叶思”（驗活合格），工人身上就象千斤重担落地；若說声：“叻！叻！”（不行），工头們跟着就罵：“你們他媽的就瞎了眼！怎么干的？这不是給老爷丢臉嗎？就光知道要錢！”这一来，干活時間不知延长到何时結束，狗腿子不点头，就得一直干下去。

凄慘的孕妇：进洋行的女工，平常遭遇就很慘，怀孕后，就更慘了。只要資本家发现她們怀孕或帶了小孩，不分皂白，一脚踢开。女工石佩云說：她那时在錦記洋行做工。怀孕期間，用腰帶将肚子纏得越紧越好，生怕資本家发现，踢了飯碗。忍着揪心的疼，好容易熬过了九个来月。产后第三天就帶着小生命上班了。怕資本家看見，上班时把孩子象扫帚疙

瘡似地裹在腰里。一进工房就偷偷把孩子放在桃仁箱子里，或盖在筛子下面。等资本家、工头不在时，好心的姐妹们忙把孩子抱给她。退休工人张郭氏生下孩子第二天，就把孩子放在家里上班了，走路象踩棉花套似的，脚下高低没根。姐妹们劝她：“张姐呀！这可不是强挣扎的，坏了身子，将来怎么治呀！”她没法子啊！不上工，一家大小就会饿死。她干了一天，晚上回家，孩子已饿死了。孩子死了，她也落了一身产后病。

冷冻五臟：冰天冻地的腊月，洋行加工房里，从来不生炉子，也不糊窗纸。寒风凛冽，冷气逼人，工人个个冻得打哆嗦，冷气冻透五臟。加上脚下冰块似的洋灰地，一千三四个小时，上无暖衣，下无棉鞋的穷哥们，谁能受得了呢？每过一个严冬，个个手脚冻得皮肉裂开，往外冒血。女工黄桂荣的手脚至今还留下小窟窿。她说：“那时，半夜三更爬起来，出了冰窖（指自己家里冷），又进寒窑，脚手冻得红肿，活象个发面饅头，谁要碰了，马上疼得晕了头。”她说：“要不是解放了，我的脚就会冻掉在洋行里，我也会死在洋行里。”

“喝我半碗水，还我半碗血！”在冷似冰窖的加工房里干活，工人们竟连多喝一口热水的权利也没有。如狼似虎的资本家，一天只放一次热水。好几百工人，只有几小桶水，哪能够喝呢？每到中午放水时，一人最多只能弄个碗底润嗓子。就是这一口水，谁也不肯喝，为的泡一下尽是冰碴、冻成冰块似的饅头。王金凤说：“有一次，我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想暖暖心，多打了半碗开水，谁知被狗腿子看见了，张嘴就骂：‘你个穷鬼，连口水都没喝过，多喝我半碗水，还我半碗血！’他说着举手就要打，我一挡，狗腿子顺手把一碗开水

倒在我头上。”

永远不忘阶级仇

在旧社会，工人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残酷的剥削、欺凌和污辱，成年累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呢？老工人王福海说得对：“这都是帝国主义者和剥削阶级的罪恶。”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劳动人民翻了身，做了主人。他们愉快地为国家创造着财富，过着劳动幸福的新生活，日子越过越甜。今天，我们要翻身不忘本，永远不忘阶级仇，永远跟着共产党！

碼頭工人的遭遇

周作新 楊会业 聶振义

大連海港，过去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剝削中国人民的“吸血口”。这个被他們夸称的东方名港，却极少有机械化装卸設備，船舶装卸工作絕大部分是靠人力。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四年期間，这里曾有四万八千多名装卸工人，他們白天黑夜像牛馬般地劳动着。

奴隶般的生活

工人在工头的棍棒催逼下，拚命地工作着。每一天，至少要劳动十一个小时以上，連續二十四个小时也是常事。因为工人多劳动一小时，工头就可多得一小时的剝削。

那时的一个装卸工人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們五个人被分配去装車，到吃飯的时间了，工头却怕吃飯耽誤干活，故意不把飯送来，逼着他們繼續干。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連累带餓实在干不动了，他們要求去取飯，工头一听就火了，抡起洋鎚把，劈头盖臉打下来。就这样，他們在工头武力逼迫下沒吃飯、沒喝水，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五个人装了六火車皮，一个人平均装了七万二千斤。这样的劳动强度，再加上饥渴，誰受得了？工人张芝丰，剛回到紅房子，就累得吐了血。沒休息几天，工头又逼着他上了工，在現場，見他活干的慢，摸腰就是两洋鎚把，打得张芝丰倒在地

下，鮮血大口大口地往外噴，不到一个星期，就死去了。像这样累死、折磨死的人，大連港每天都有不少。

当时，大連港的工人，实际上还比不上牛馬。大連海港的全部装卸业务，都包给了“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工人进了这个“会社”，就等于进了“阴曹地府”，牛鬼蛇神一大堆，全压在工人头上。在福昌会社里，光是大头、监督、先生就有三百多，手拿鎊把监视工人干活的二头还不算在内；在紅房子周围，有大衙門（警察署）、小衙門（派出所）；在事务所里，有宪兵、警察、刑事、巡捕；在海港内，有监督、水上警察。他們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毒打工人。有一次，工人康小魚从三十五号庫往船仓里装貨，他往下放的时候，仓里的工人李富春沒接住，把箱子摔裂了一道縫，工头孔庆安就让他俩每人手举两碗水，跪在碎磚头上。時間一长，胳膊哆嗦，把水洒出一点来，孔庆安掄起鎊把就打，一直打得两人昏过去方才住手。他們被打以后，足足躺了四个月才能起炕。

工人上下班都走十三号門，这地方簡直是个“鬼門关”。不分冬夏，工人上下班都得把上衣敞开，把褲子褪到脚脖子，等候守卫搜身。夏天还好，一到冬天，本来穿得就极其单薄的工人，赤身露体怎能抵得住刺骨的寒风！但是守門的日本鬼子和走狗，看到工人瑟瑟发抖，居然丧失人性地拿起一桶冷水往人群中泼去。他們看到工人被淋而颤抖更凶的样子，兽性得到了滿足，就拍手頓足，哈哈大笑說：“这个，大大暖和暖和的！”

这就是奴隶的生活！誰願意作奴隶，誰願意当馬牛！民族的苦难，階級的仇恨，充滿工人們的胸膛。他們的这些苦，怎不激起我們无比的痛恨和憤怒！

资本家、工头的盘剥

大连港的资本家和工头，对工人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层层剥削。

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到外地招收工人的时候，說得天花乱坠，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山东破产农民、上海失业工人，被他們騙来。一到大连，完全两样。

资本家把工人装卸货物的工资撥給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究竟撥給多少？工人根本无从知道。于是“大柜”、“二柜”上下其手，尽情克扣剥削。比如說，十个工人干一天活，装卸三百吨货物，先生記在眼上的却是二百五十吨。那五十吨的工钱由大柜得去了。然后，这二百五十吨的工钱又分成十一份，不劳动、而且用棍棒毆打工人的二头也平白得去一份。但是，工钱根本不是按月发給工人。开餉，只是在三大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才給工人开餉。这正是大头、二头、先生們剥削的手段。工人手里沒有钱：吃饭，大头开有食堂——記賬；住宿，会社修得有宿舍（即有名的紅房子）——記賬；春夏秋冬要換衣服，工头一总給你买来——記賬；……可是，这記的是一笔敲骨吸髓的閻王賬啊！吃的，一頓两个苞米皮、高粱糠和豆腐渣做的窝窝头，外加两条咸菜，湯是鍋底水，每月飯钱固定是七元六；穿的，是他們花两元钱从自己开的商店或是从当鋪买来的旧貨，賬上記的却是五元。到三大节开餉的时候，工头、狗腿子橫着洋鎊把在旁边一坐，先生把算盘劈里叭拉打一气，然后叫，“张三，你这几个月扣除了飯钱、房钱、买东西钱，沒了！”工人疑惑地說，“不对吧，怎能扣这么多？”“甚么他媽不对，你自己看！”——装卸工人

絕大部分不識字，根本看不明白他的賬；即使識字又怎樣呢？那個翻番記賬法，你看出來也沒話可說了。在這個時候，工頭把洋鎊把一立：“媽的，老爺還賴你的賬？滾出去！”有一個工人，經工頭的手買了一件夾袄，等春節算賬的時候，不但一年活白干了，還倒欠工頭兩元八。所以，工人非常盼望三大節開餉，但又怕開餉。因為開餉只不過是“五月節看看，八月節算算，過年倒欠。”等欠了工頭的錢以後，就不用想翻身了，白干一年二年，也休想還清。

因而，這些工人沒有一個人能穿上一件像樣的衣服，能存下一元錢。那些獨身工人，大都是把草袋子摳三個窟窿，伸出腦袋和兩手，就算是件衣裳。

沉重的勞動，不斷的毒打，殘酷的剝削，壓榨得工人過早地衰老或殘廢。工頭一看哪個人沒有了剝削價值，就一頓棍棒攆出去，流落街頭。一到冬天，每天晚上，在寺兒溝大橋旁邊的便所里，都有二十多個衰老殘廢的工人被凍死。當時有一首悲慘的歌：

活着當牛馬，病老趕出來；

路上死，路上埋，狗肚子是棺材。

像這樣沉重的欺凌和壓榨，工人卻沒有地方可以去講理。設置在這一帶的大衙門、小衙門，原來就是為了鎮壓碼頭工人的；而且工頭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錢，除了他們自己享用以外，還按時送給憲兵、警察、刑事、巡捕一部分。他們互相勾結、串通一氣。如果你告狀，馬上就成了政治犯。那麼，跑也不能嗎？不能，沒有證明，火車票、汽車票、船票都買不到手，而且在車站里，成天有警察巡邏着。

“紅房子”和“碧山庄”

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情况过早地促使工人死亡。

“紅房子”——要睡四万多碼頭工人，整整是一百栋，但占地面积只有两万六千零二十五平方米。也就是平均每人只有零点六五平方米。每一栋房子都是二层，但举架极矮，而每一栋房里，都是双层吊鋪。尽管如此，每个工人睡觉的地方还没有一尺寬，如果夜間上便所，回来就挤不进去了。

像这样密集的居住条件，自然容易疫病流行。工人不幸得了病，那只有死路一条。

在紅房子东边，有一座“碧山庄”医院。工人都管它叫“閻王殿”。来到这里的病号，輕病变重病，重病就装棺材。重病号的床鋪是用混凝土砌的，因为护理人员不肯替病人接大小便，如果病人在床上大小便以后，他們也不扶病人起来，就抄起水管子来冲洗。这样，病人病情当然要加剧，还没等病人咽气，就给扔到墙外边去。墙外备有薄木板匣子，两人一个匣子，拉到山坳，再把木匣拉回来重装。一九四二年，紅房子传染开伤寒病，从这个医院拉出去的死尸，平均每天是一百六十六个。一九四一年从上海来的一批三千多工人，这一次几乎死光。

为什么这样对待病人？这是因为，医院治病当然要錢，而工人得病，工头既捞不到剝削，又需拿錢治病，他怎么肯？所以他們和医院里的人一勾結，就想办法让工人赶快死去。

因为工人大量地死亡，虽然“福昌华工株式会社”每年不断地到外地去招騙补充，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前

夕，紅房子的工人只剩一万多人了。

当家作主

解放以后，碼頭工人，从地獄走向天堂，变成了真正的主人。

现在，这里的装卸作业，主要是靠现代化的机械。一些散装货物用不上机械，领导上也一再动员技术人员和工人想办法革新工具，减轻体力劳动。光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辅助工具就有一百四十多种。

领导一直强调安全劳动，工人劳动一般都有劳动护具。冬天进船装大豆，穿长毡靴；装瀝青，戴防毒面具……

以前扛豆餅、抬铁軌的“苦力”們，现在有很多都成了机械司机了。解放后，领导上就把他們几十个装卸工人和新来的青年們，分批送进机械司机訓練班。这些旧社会在棍棒下当牛馬的人，在党的培养下，现在都成了优秀的司机手。

以前挨打受罵的装卸工人，现在都成了大連海港的主人翁！这个有名的大海港，管理工作有他們来参加，有好多規章制度和措施，是他們制訂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光是职工代表大会就开了十八次；他們在十年中提了三万八千八百多件合理化建議，經過整理已被採納的就有一万五千四百多件。

现在的干部和工人是一家人，是同志。哪个干部有缺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給他提意見。

工人不仅参加海港的管理工作，像老装卸工人王玉吉还当了全国人民代表。

原来每栋住四百多人的房子，經過改建，现在只住十六

家。家家窗明几净。靠东边的两栋红房子，现在是小学校。

工人除了按月领工资以外，还有很多是通过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形式表现的附加工资。大连海港设有医院、保健站、幼儿园、俱乐部、理发室、洗澡室等等福利设施。工人有病，完全是公费医疗。那个号称“阎王殿”的“碧山庄”医院，已经改建成旅大市工人养老院。里面住着一百二十七位老工人，有的在乘凉，有的在看报，有的在下棋，有的引吭高歌。他们说：“要在解放前，像我们这大岁数的人，早被资本家撵出去死在街上了，哪能想到像现在这样！”

胶州湾盐场简史

张天德

在胶州铁路的东端，东起女姑口，西至胶县南的东营，绵亘百余华里的海滨上，布满了白茫茫的盐池和盐堆。这就是我国海盐产区之一——胶州湾盐场。

看吧，在这大地碧海之间，遍地风车如同雪天里无数朵白牡丹，迎风转动，媲美争艳。机房里的抽水机在吼叫，汹涌澎湃的海水驯顺地从渠道淌进储水池，然后经过蒸发池，灌入结晶池，慢慢由绿变白、发固，制成雪白的盐。在这里，真是盐堆似山，盐池如镜。盐场内，技术组长手持“婆美氏”表，这个盐池量量，那个盐池试试。运盐的盐工们，推着胶轮小车，在阡陌纵横的池埂上，行走如梭。盐场外，专用机车拉着一长列满载原盐的车厢，沿着专用铁路，驰向全国各地。港沟内船舶密集，不停地把原盐驳运到港口，归坨待运。大家都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奔忙。

但是，在解放以前，在这环抱胶州湾的盐田上，盐工们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摧残。

沉重的劳动

那时盐工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至少十三、四小时，多则十五、六小时。老盐工赵同和说：“我在替滩主干活时，早晨两点多钟就要起来，先挑七八担水，担完水，就下滩。

一上午撈完一付盐田的盐（約四点五吨），装满十五吨重的一只船，还要把撈出的盐抬到坨上。上午干完盐場活，下午还得替滩主干庄稼活，一直干到滿天星斗才能收工。真是上工下工，两头見星。”

如此沉重的劳动，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很难坚持。王光曉的弟弟来盐場第一天就累得吐血。有一个姓冷的青年工人，一天上午，在一个一千八百平方米大的盐田里干活。先是推淨一百多立方水，再推淨池內淤泥，然后用石碾子将池底压光、压硬，放好水。干完活，他往地上一坐就昏过去了。滩主还說他“有意捣乱”，要打要罰。南万盐場有一个盐工，給地主干了三十六年活，最后活活累死在盐場里。

那时盐工下池抬盐，連垫肩、泥袜子都沒有。大家都是赤身露体，抬着三百多斤重的大盐筐，行走在狹窄泥濘的池埂上。稍一不慎，就有摔伤致死的危險。一天夜里下大雨，把头张树林，手执棍棒赶着工人出去搶撈盐斤。盐工王光曉和孙一正摸着黑撈滿了一大筐盐，向上抬时，看不見池埂，一下栽到卤沟里，腿被石梭子划破了一条二寸长的大口子，鮮血直流，疼的絞心。就这样，还不敢吱声，弄些烂泥糊上，又去撈盐了。那时抬盐，木杠子磨得肩膀上的皮比脚后跟上的皮还厚，要吸烟，掏出火柴在上面一划就着了。两只脚踏在鋒利的盐碴上，被割得布滿了一道道的血口子，再被卤水一浸，疼得直钻心。晚上下了工，得先用淡水把伤口里的卤水洗出来，疼輕了点，才能睡着。

由于劳动条件极端恶劣，防护用品很少，工伤事故也就特別多。盐工負伤后，还得照常干活，伤重不能干活的盐工，还得家中来人頂替，沒人頂替就被开除。地主、資本家

規定，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中途下工，就不發工資。老鹽工于洪祥，因鬧風車被摔死后，工錢沒給，還得自己家請人抬走埋葬。

殘酷的剝削

灘主、資本家對鹽工的經濟剝削是非常殘酷的。

鹽工上工和下工，一年分春秋兩季，從舊曆正月十六到六月十六為春季，從七月十五到十月十五為秋季。工資按季定價。舊社會的鹽工都是地主、資本家從“寬漢市”（鹽場附近較大集市）雇來的，工資由他們定多少是多少，被雇人無權過問。而且規定春不到六月十五，秋不到十月十六要下工的，不僅不發工資，還要退還飯錢。

那時鹽工的工資，雖然以糧食計算，可是，地主、資本家總是按上工時的糧價，強行把糧折成錢。那時，糧價又不斷上漲，到下工時領到的工資根本買不出東西來。老鹽工王光曉解放前給地主王希武干活，一年工資二百二十斤麥子。並且說定清明節給三升，其他分別在五月端午、八月十五和十月十五給。可是，從正月十六一直干到四月底，再三去要，一粒麥子沒給。一天，家里實在沒的吃，他母親跑了八里多路，去求告王希武少給點錢。好不容易叫開王希武的大門，他正在廂房里端着小酒壺喝酒。王光曉他娘在院子里等了好長時間，他才邁着四方步走出來，蠻不講理地說：“說沒有就是沒有，有錢也不給，剛來嘛！得干干看看。”“你看在我這老婆子面上，給幾個吧！再說，孩子不是在這干了好幾個月了嗎？”母親央求說。狠心的王希武把小黃胡子一捋，臉色一變：“不給就是不給，別再羅嗦。”

資本家和地主不但不按期發工資，鹽工年底下工時，還要扣下一部分工資作“押金”，這叫作“錢保人”或“拴人錢”。地主、資本家就是用這樣一條无情的鎖鏈拴住工人的手脚，讓工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為他們賣命。鹽工孫再法的父親，干了二十多年活，每年都被資本家扣去一部分工資，直到老得不能干活回家了，扣去的工資還沒發給。

舊社會，地主、資本家還有一個剝削鹽工的手段，就是“干使人”。地主孫茂齋，有四付鹽田，一共雇了十個鹽工。他通過打、罰和加重勞動負擔等毒辣手段，使這十個鹽工沒一個能干完一季活的。孫茂齋過幾天打走幾個，再從“寬漢市”雇回幾個。三年之內，這十個人不知換過多少次，而地主孫茂齋卻在這三年內沒花一文工錢就白白收獲了四千八百多噸鹽。採取這種殘暴手段的，何止孫茂齋一家。在馬戈莊鹽場，號稱壓在鹽工身上“四座大山”的孫省山、孫朋山、韓仁山、孫學山，還有其他鹽場主，哪一家不是如此呢？有的地主還專門在春季鹽場活重的时候，雇用一些“雛巴”（十六、七歲，第一次干鹽場活的青年）。雇來以後，就百般打罰虐待，迫使這些“雛巴”干到三四個月，即放棄工錢，離開鹽場，另尋生路。

過去在鹽工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進了鹽場地，好似進監獄，出的牛馬力，吃的豬狗食，什麼沒掙着，賺了兩腿泥。”

飢寒交迫的生活

那時鹽工窮得做不起衣裳。退休老工人劉化瑞結婚時做了一件夾袄整整穿了四十年，上面補釘落補釘，足有五斤多

重。孟光悅将他父亲穿了二十多年的一件破夹袄接过来，补了又补，又穿了十三年，称了称七斤多。盐工們既沒有穿的，就更談不上鋪盖了。不少盐工冬天是“身下鋪狗皮，身上盖乱草”。老工人张德礼，干了十几年盐工，才置上一条薄被子，以后又被土匪搶了去。比較寬裕一点的盐工，晚上两人合盖一条棉褥子就算不錯了。但夜里睡觉和板上釘釘一样，一动不能动，如果翻翻身，两人还得喊个“一二”，一齐翻。

說起盐工吃的，多半是玉米面、橡子面、地瓜面。就是这些东西，地主、資本家也不让盐工吃好。他們把面买回来，倒在潮湿的地上，泼上污水，在上面喂羊喂鸡，任其糟踏。直到霉得长毛发紅，才給盐工吃。这种面做出飯米腥、酸、苦、辣、臭，五味俱全。盐工称它为“五香面”。甚至有的地主还把发了霉的橡子面掺上火油，使盐工吃在嘴里，咽不下去，吃一点就鬧肚子。

至于盐工的“宿舍”，正像盐工們說的一样：“盐工住窩棚，一天三鞠躬，夏天一湾水，冬天雪飞騰，誰怜蚊虫咬，掙扎熬活命。”这种窩棚，就是在盐滩上挖半米深的坑，用三根木棍撐个架，上面盖些乱草，里面再用土垫个台子当炕。真是夏不遮雨，冬不擋寒，又潮湿，又矮小。爬进爬出連腰也直不起来。一到雨天，上面漏，下面渗。在夏秋天，窩棚里蒼蝇、蚊子、臭虫什么都有。冬天被留在盐場“看滩”的盐工更是凄凉。寒风一来，几个人蜷縮在一起，晚上冻急了，就把炕挖个坑，下面鋪点草，人躺进去，上面盖上苫。

在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下，有多少盐工們干一辈子穷一辈子，娶不起老婆成不起家。老了之后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死于异乡！

盐場新貌

解放后，胶州湾的盐工們，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一样，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一九五五年，国家分別沒收、征收了封建所有制的盐田，对資本主义和个体所有制的盐田，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六〇年，就全部成为单一的国营盐場了。

十几年来，党和国家为了減輕盐工的笨重体力劳动，撥出大量資金，增添了各式各样輕便省力的生产工具，和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設備。看吧！解放时寥寥无几的风車和根本看不到的提卤車，現在已經遍灘皆是。在納潮揚水工地上，工人用的戽斗子早已絕迹；調水、提卤已經用上了小型抽水机；抬盐用的大盐筐和杠子，早已被胶輪运盐小車所代替。

此外，还添置了大量的劳动保护用品。工人們工作时有工作服、垫肩、泥袜和胶鞋；雨天工人們身穿雨衣，脚蹬长統雨靴，安然地下池作业。炎夏有解渴消暑飲料；冬天有防寒的棉大衣、棉帽子和棉手套等。

作为工业主要动力的电，自一九六一年已經开始深入这里。三年来，在盐場的心腹地带，长达数十里的广阔海岸上，已經形成纵横交錯的电力网，各种型号的电动机愈来愈多地安裝起来。雨夜搶撈盐，只要把电門一开，工人們就可以在无数道探照灯的照射下，如同白天一样地精心操作。

随着生产的发展，党和国家从多方面关怀着盐工的生活。为盐工新建宿舍，达二万五千八百多平方米。盐工們从阴暗潮湿的土窩棚，搬进了寬大明亮的大瓦房。实行了固定的工資制和八小时工作制，并且全部享受劳动保險待遇。新建了

职工食堂、职工医院、保健站、疗养所、澡塘、理发室、托儿所和幼儿园等。

盐业工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盐场里，开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解放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盐工不识字，而现在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就有两千多名。新建了职工俱乐部、运动场、图书室。滩内普遍架设了广播网。工人们下班后，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或者上夜校学习文化技术，或者按个人的喜爱参加各种文娱体育活动。

老盐工孟光悦，旧社会在盐场里做了十三年苦工，解放时还是一个字不识的晒盐工。十五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现在已经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成为胶州湾马戈庄盐场的指挥员——副场长了。老盐工韩敦仁在旧社会目不识丁，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现在已经成为永裕制盐公司的工程师。

盐池怒火

郭潤田 大 珍

在山西省运城县，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盐池。多少年来，它盛产的“潞盐”，销行北国，闻名海内，被誉为“万宝池”。

昔日盐工苦

这古老而富饶的盐池，在解放前却是一片悲惨景状。从古代的封建王朝起，就环着盐池的周围，修筑起一道“禁墙”。禁墙之外，布有“岗哨”。盐池变成一座阴森森的大牢狱，不知多少盐工，冤死在禁墙里。

每天天不明，盐警打开“牢门”，工头手持皮鞭站在门口，赶着工人上工。从天不明一直干到太阳当头，吃过午饭后，工人哪有喘气的时刻，工头吸一支烟，喝一杯水，连喊三声“起、起、起”，就得随声起来干活。从中午一干就得干到满天星斗才收工。

夏天，晒盐需要盐水。盐水在低洼处，提取盐水时，工人对拉一个大水斗，级级层层，一斗一斗往上提水。斗线是用麻绳榨成的，提水时绑在手上，像箍上了手铐。每拉一下，就是一阵剧痛。谁拉得慢一些，工头们不是骂就是打。这号活，谁都害怕它，资本家把坐港提水叫做“好汉台”，工人们叫他“送命台”。不知多少盐工，在“送命台”上送了性命。

工人们干的是这种牛马活，可吃的却是猪狗食。早晚两

頓，是陈谷米做的“稀糊糊”，午飯是一頓又酸又硬的麸子面“老饅”，沒有一点菜。可就这样的飯，还不让工人吃飽，有的工人正在干活的时候，就突然倒在地上死了。有很多老工人至今还很伤心地回忆起一个叫胡拐腿的工人的悲慘遭遇。胡拐腿有次餓的支持不住，吃了資本家狗棚里的狗食，工头知道了，拿起木鏟把，狠狠地打了他一頓。胡拐腿身上打烂的地方，被盐水一泡，潰烂成疮，疮里都生了蛆，工头們見胡拐腿不行了，乘工人們上工的时间，喊来几个狗腿子，說：“把这个死鬼扔出去埋了！”埋的时候，胡拐腿还“唉哟”地叫喚。胡拐腿当了五年盐工干了十年的活，却落得这样的下場。当时，像胡拐腿这样遭遇的盐工，又何止一人呢？

卖命二十年

盐工在这里死的死了，活着的也是一无所得。无论是封建的盐池主，还是盐池官僚資本家，都挖空心思，用血爪从盐工最低的工資中尽量榨取利潤。他們不但侵占了工人所創造的剩余价值，并且野蛮地榨干了工人們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曾經当过官僚財东薛某盐場的一个賬房會計，揭露資本家榨取工人工資的罪行时說：这个官僚資本家，每年雇佣盐工三百多人。当时給盐工規定的工資，是每人每月平均三元，一年上工十个月，应賺工資三十元。合計起来，全年三百个工人，应发工資九千元。这样的工資，本来是最低的了。可是，全年实际发出的工資，最多不过五千元，而其余四千元，也被資本家装进腰包。

資本家为了把給工人的工資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就大

量雇佣童工。那时，十五六岁的童工，就占盐池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张国成在十五岁的时候来到官僚财东薛某的盐池，工头看他年纪小，不给他规定工资。第二年，总算给他定下了每月一元八角的工资。可是，工资仍然拿不到手，而是拖延到年终算总账。这样，资本家就可以达到“以工养工和以工养场”的可耻目的。平日，工人没钱买东西，资本家乘机又加了一层剥削，从城里买来些日用品，赊给工人们。这年，张国成赊了五六斤小菜，十几尺土布，年终算账时，连本带利七折八扣，只落下六个月的工资，弄得无法养家，爹爹活活地饿死了，妈妈被逼得流浪乞讨。张国成干到第三年，因为吃了上年赊东西的亏，什么也不敢赊了。只盼着，多落几个钱，抚养讨饭的妈妈。哪知，这年年终拿到工资时，票子变成了“废纸”。全年赚下的工资，还买不下八斗粮。张国成拿到工资，痛哭一场，这些“鬼票子”，寄给妈妈有啥用呢？

还得干下去。到年终快要发工资的时候，资本家又施出了往年惯用的毒辣手段：那平时把守严密的“禁门”便大开了。狗腿子们加倍拷打盐工，许多盐工，忍不住毒打，只好不领工资去逃生。最初几年，张国成宁愿忍受毒打，不愿逃走，只为赚钱救爹娘的命。这年，他再也忍不住了，不等领工资，就逃出了盐池。可是，逃出去也是走投无路，只好又返回盐池卖命。

年复一年，张国成整整在盐池干了二十年，只落得家破人亡。他算了算，在盐池这二十年里，至少为资本家产盐四百吨，一列火车也拉不完呀！可是，他所赚的工资，还养活不了一口人！

盐工头上“五层楼”

在盐池，官僚资本家建立了一套封建把头制度，豢养着一大批爪牙，这就是什么“老和尚”、“老板”、“二掌坎”、“三甲槽”、“四排子”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工头，就构成了官僚资本家压榨和剥削工人的一套严密机器，工人称他们是压在自己头上的“五层楼”。

官僚资本家衡量他的爪牙是否“忠实”的标准，是看他们能不能下毒手迫害工人，能不能为他榨取更多的利润。像打骂工人最出色的外号叫“黑狗熊”、“杀牛贼”、“孔二瞎”等把头，是最受官僚资本家“宠爱”的。像“杀牛贼”每年得到的酒钱，就有一百多元。这酒钱比十个工人一年的工资还多。官僚资本家常常对他的打手们说：“打吧！打死一个人不要紧，不过豁上个盐角。”把头们有主子给撑腰，更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了。难道他们不怕犯法吗？怕什么，衙门就是他们的主子开的。单是抖开官僚资本家杜衡的家谱看看吧：他投靠着战犯孔祥熙，曾任国民党南京财政部委员、盐务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后又投靠汪精卫，担任日伪南京盐务顾问。他的父亲杜老大，是晋南大恶霸之一，担任盐池警官。他的叔父杜老三，任阎锡山山西陆军兵站总监。这样的官僚资本家，大权在手，权势显耀。官家派来的盐警，名义上是维护盐池，实际上也是他们带枪的狗腿子。这样，盐池官僚资本家就有了维护剥削的两帮凶手：一帮是拿棍棒的凶手，一帮是带刀枪的凶手。盐工在他们的欺压下，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黎明前的斗争

盐池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压榨，曾进行过英勇的反抗。

一九二七年，运城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共产党员曹守明等同志，到了盐池领导工人斗争。从此，盐池工人有了党的领导，看到了光明，找到了方向。一九二八年，盐池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一次罢工斗争。这一天，天还不明，工人们就聚集起来了。于是，三千余名盐工，汇成一股巨流，高呼着“提高工资！”“反对残酷剥削！”，一直奔出“禁门”。盐池工人，第一次有组织的罢工开始了，这次罢工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罢工以后不久，敌人加强了白色恐怖，破坏了盐池党组织。但是，盐池工人的斗争，是扑灭不了的。

一九四七年，运城解放前夕，盐池官僚资本家勾结敌人，还想最后挣扎，企图劫走存盐和破坏盐池。党领导下的盐池工人，拿起盐锤铁棍，和敌人勇敢斗争。盐工们白天守卫着盐池，夜晚组织起来抢运食盐出池，支援解放战争。在工人的顽强斗争下，敌人的破坏计划被彻底粉碎了。斗争胜利了。

一九四八年，运城解放了，人民的宝池还家了。古老的盐池见了天日，围墙拆毁了，禁门推倒了，关卡解除了，压在工人头上的“五层楼”推翻了。盐工成了盐池的主人。

今日的盐池

解放以来，这里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条件不断改进。提晒盐用的卤水，是盐池过去最繁重的一项劳动。如

今，已安起了数百台电动抽水机。盐工过去那种漫长沉重的体力劳动彻底改变了。

随着盐池生产的迅速发展，盐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在不断提高。盐工的集体福利事业，也不断在发展。几年来，盖起了两万四千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还建起职工医院、疗养所、俱乐部、业余学校。原来一千多名不識字的盐工，现在都达到了小学以上程度。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一幅崭新的图景出现在盐池。几年来，盐池逐年增产，除了年产原盐六万多吨以外，还盛产芒硝、硫化碱、元明粉等化工原料。这些产品，销行全国，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米行街上的“蛀虫”

章承德 楼培浩

解放前，浙江省的湖州，是米行老板——“米蛀虫”的集中地。这里的米行象蜘蛛网那样遍布全镇，光是不到半里长的米行街，就有乾昌、盛昌、源盛、永盛、福昌、庆丰等七十多家米行。

米行老板凭着“钱”、“势”，刮尽了农村的地皮。象乾昌米行的老板沈田莘，就是在长兴、泗安等地占有九千多亩土地的大地主，每年光是租米一项就有二万多石。这些寄生虫为了“生意兴隆通四海”，与国民党官僚、地头蛇相勾结；盛昌米行老板吴学范，拜国民党陆军第一师参谋长苏尧鑫和青红帮头子沈锡麟为“先生”；臭名远扬的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驊，是隆昌米行的股东老板；乾昌米行特聘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陈勤士为“名誉董事”。这样，每逢粮食登场或者涨价的时候，官僚爪牙、地头蛇就在米行门口川流不息，为所欲为。逢到时局紧张，他们就在棧房门口挂上“陆军军粮”、“国粮不卖”的牌子，伺机哄抬粮价。每到收租季节，官府又派出大批军警，追逼债户，掀锅盖、敲镬子，打人、捆人，无恶不作，弄得鸡飞狗叫……

剝削手段囊利刀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或是在米行做过工的人，都知道米

行老板怎样用各种手段盘剥农民。在这条绞索上破产的农民何止万千！

一九三四年大旱，吴兴一带河港干涸，稻田龟裂，鱼蕩、藕蕩都象朝天的鏟子。农民一无所获，生活十分困苦。郭海庆的父亲郭大伯，备了礼物，托人向泰昌米行的股东、大地主赵独眼借来五石大米。三年以后，郭大伯的债滚到了二十多石，债主早催夜逼。没办法，他只得将蕩田圩的五亩田抵给了赵独眼。

此后，郭大伯似痴似呆，早一趟、晚一回地在蕩田圩轉。一九四四年，郭大伯貧病交迫，赵独眼又乘人之危，装出了一副“慈善”面孔，借给郭大伯五石大米去“治病”。连前一算，郭大伯的债务又是四十石了。

这年冬天，郭大伯的病越来越重。一天，赵独眼的狗腿子上門逼债，揮鞭拍桌，命令郭大伯三天后交出四十石大米，否则将家产作抵。

三天后，那群吃人的瘋狗又上門来逼债。米从哪里来呢？就是挑四十担泥，郭大伯也是无能为力啊。从早上到傍晚，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托了多少人讲“情”，才被同意用三间房子抵了二十石米，还债一半。郭大伯在契約上画押以后，晕倒在地……

父亲死后，十六岁的郭海庆同母亲就挑起了生活重担。到了一九四八年，郭海庆的米债又滚到了一百多石。这年正月，在债主的追逼下，他只得又将一只藕蕩和三亩三分桑地抵给了赵独眼。同年三月，又将仅有的一只蕩和三亩桑地全部出抵。前后几年的时间，郭海庆的家业就全部滚进了泰昌米行。

米行老板的剝削手段举不胜举，剝削之殘酷令人发指。众所周知的还有“米里掺水”，“掺石粉”，“大秤收，小秤卖”，“大斗进，小斗出”（斗下部装一块活动的板，叫仙人板）等等。这些象一根根吸血的管子，无穷尽地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靠着米囤餓煞”

也許有人会說，在旧社会里，在米行做工的工人总会吃頓飽飯吧？錯了！吃得飽飽的是那些肥头大耳的“米大王”、“米蛀虫”。而米行里的职工做的是牛馬活，吃的是猪狗食，还是“靠着米囤餓煞”。

每逢秋粮登場，是粮商“蓄財”的好机会。他們以杀价大量收购稻谷，象湖州最大的乾昌米行，一天就进几千石甚至上万石，可以吞沒吳兴、长兴、宜兴的全部貨源。貨多了，工人的活也更重了。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刘阿大在乾昌米行当脚班，全家四口已三天沒米下鍋了。生活越过越苦，劳动量越干越大，刘阿大瘦得皮包骨头。那天，来自长兴、宜兴的几条大駁船装着近五千石稻谷，老板限在下午三点钟前卸光。因此，工头命令工人提前两小时，在清晨三点钟就上班。按老板的“規矩”，每人每次要背两袋，重一百五十斤，少了就得解雇。刘阿大已經餓得眼里直冒火花，背上一百五十斤的稻谷，肩上象是压上了泰山，走路搖搖晃晃。刚跨出船沿，在搭板上走几步，“拍塔”一声就倒了。两袋稻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口里直吐鮮血。抬到家里，刘阿大睜开了眼，看着餓得快要倒下的妻子和孩子，刚张嘴想讲几句话，不料一口鮮血塞住了喉头——他就这样带着滿腹的冤仇死了！

刘阿大死后，工人和刘阿大的家属要老板出安葬费。老板却轻描淡写地说，“自己不当心，怪谁呢？要我出钱，岂有此理！”

工人郑小海说：“人死了也该有个葬身之地，起码薄皮棺材也得买一口！”

“我的家业不是给你们买棺材的！”

在豺狼面前，有什么理可说呢！后来，还是工人们搞来了一张芦扉把刘阿大埋葬了。

此后，刘阿大的老婆气得疯疯癫癫，含着海深的冤仇离开了家乡；他十三岁的女儿也成了孤儿。

黑暗的旧社会制度，残酷的剥削者，不知吃去了多少个“刘阿大”，不知给劳动人民制造了多少灾难！

货币贬值米价飞涨

抗日战争时期，粮价就象钱塘江的怒潮，日涨夜高，官方的牌价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一九四八年八月，反动政府又搞出了发行“金圆券”，搞“限价”等新花样，结果是物价越“限”越高，粮商囤积了大批粮食不卖。那时，盛昌米行老板吴学范在湖州，以每石四十五万元的价格，收进了五百八十多石，装了四条驳船运至杭州、临平一带，又以每石七十五万元的高价出售，攫取暴利。特别是到解放前夕，米价更是日高夜涨。据《湖州湖报》载：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米每石为一百万元（金圆券），四月二十三日即为一百七十万元，四月二十四日又涨到一百九十万元，三天当中涨了将近一倍。

那时工人拿到一天的工资往往糊不了口。现在在湖州搬运站的老工人郑小海，那时在正生米行当脚班，一天，他和

工人們去領工資，工頭們正瓜分从工人身上刮下來的“紅利”，因分贓不均，吵鬧不休，直等到下午四點半鐘才拿到工錢，這時米店早就打烊了。第二天，能買九升米的鈔票，只買了二升爛蠶豆。

反剝削的怒火

但是，工人、農民絕不會忍受這種盤剝。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勞動人民，就憑着一副硬骨頭，不斷地進行了反剝削的鬥爭。

一九四八年春，解放大軍節節勝利的捷報从城市到农村，处处相傳，人心振奮。剝削階級感到末日來臨，企圖再撈一把。

在城市，只見大駁船日夜不斷地把大米往外運，而米行門口却挂着“到貨寥寥，賣米有限”八個大字。城市里的勞動人民，拿着幾個活命錢，三天兩頭買不到一粒米。有時米行老板看到街頭巷尾買米的人群擁擠，干脆把原來的八個大字改成“米已售完”四個大字，排門上得鐵緊。勞動人民被逼得實在活不下去了，只有起來鬥爭！一天，全城一百多個黃包車和汽車工人都拿着淘籬、畚斗，齊集在億泰米行門口，要求買米，要求穩定糧價。老板看到工人們來勢洶洶，心里有些害怕，就假情假意地对工人說：“近來時局緊張，糧源斷了，米行里實在沒有米。大家買不到米，我比你們還急……”

工人一聽當場就嚷起來了，高喊：“誰听你們的鬼話，今天非買不可！要死也得死在你們的米堆里！”

這時，七八十個搬運工人聞風趕來參加鬥爭。老板一看勢頭不對，就皮笑肉不笑地說，“好！好！讓我再叫賬房先

生算算，再到倉庫去看看有沒有辦法好想……”說罷，就溜之大吉。

工人們見他溜了，就大聲痛罵：“吃人的豺狼，有骨頭站出來！”

不一會，來了一個斯文的“先生”，後頭跟着兩個滿臉橫肉的工頭。這位“先生”一露面，人們就認出他是股東老板兼湖州全城米行的理事長宋安生。這個人上至國民黨專員，下到青紅幫頭子都是他的義兄義弟，勢頭不小。這傢伙偷視了一下人群，就哭喪着臉，講話了：“諸位，米進出都得經過我的手，倉庫底子我一清二楚，現在確實是無米好賣。要是有點辦法，我總得竭力為大家幫忙……”

話音剛落，幾個工人就痛罵起來：“你們是閻羅王貼告示，鬼話連篇，誰也不聽你們這套鬼話！”

搬運工人鄭小海大聲地斥問：“你們晝夜不停地大船進小船出，米弄到哪裡去了？前幾天我們搬進去的三百石米，難道都長翅膀飛了嗎！”

這一責問，吓得他張口結舌，吱吱唔唔地說：“……明天想點辦法。今天已不早，請諸位早回……”

工人反剝削鬥爭的消息，象春風一樣吹向全城居民和四鄉農民。第三天清晨，居民、工人、農民擁集在米行街，手拿淘籬、米袋和各種盛器，滿希望能買到幾粒活命米，哪知大小米行還是照例挂着：“米已賣完”四個大字，排門緊閉。人們忍無可忍，打門聲，痛罵聲，還有小孩子的哭叫聲，震撼着米行街。人們憤怒了。億泰米行的門被打開了。人群衝進了米行。其中有人高喊：“把‘米蛀虫’拖出來，評評理。”宋安生吓得面如土色，爬牆而逃。

一小时以后，伪浙西行署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于树鬻派出了全副武装的“保安队”，象豺狼似地扑向人群，还在新桥头等要道架起了机枪。可是斗争的人们更加集中，围得更紧。湖州中学的学生闻讯后，也排队上街声援斗争，高呼口号：“支持工人斗争！”“要饭吃！要活命！消灭剥削！打倒资本家！”

口号声响遍全城。“保安队”瞪着两只眼睛，无可奈何。一个“队长”似的家伙，爬上桌子，厉声疾呼：“大家散开，不然要开枪啦！”

脚班工人郑小海从人群中挺身而出，站在刺刀前，怒目横视，指着敌人高呼：“这个世界不公平，我们为了活命，要饭吃，犯什么法。要打你们就打吧！要我们死，你们也休想活！”

“队长”恼羞成怒，用枪柄朝郑小海的头上就打。

这时，人群齐声高呼：“打就打吧！”人们蜂拥而上，围住了“队长”。保安队见势不对，夹着尾巴就逃……

这一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揭露了吃人的社会制度。群众通过这一斗争，进一步认清了剥削者的本质。

殘酷的压榨

中共洪江市委宣傳部工作組

解放前，江浙一带馳名的八大油号，就在湖南省的洪江市。在旧社会，这一座城市，是反动統治者、資本家的乐园，是劳苦人民的“閻王殿”。它历尽滄桑，有着一段痛苦的历史。八大油号厂房所在的二凉亭街，就是它的縮影。

資本家花天酒地 榨油工討米求生

二凉亭街上，那一排青磚灰瓦、高墙铁門的建筑，就是八大油号的厂房。它的周围全是一些竹籬茅舍，木板矮屋。在这些破烂矮小、不能避风擋雨的棚棚里，挤住着一百三十多戶人家，他們絕大多數是榨油工人；一些沒有家眷的单身汉，往往是“睡油床，坐灶凳”过日子。

这里的榨油工人，多数是辰溪和怀化銅湾一带的农民，他們被地主压榨得无法生活，只好离乡背井，沿途討乞，来到这里榨油为生。在旧社会，穷人哪有立足的地方啊！就是出卖劳动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得先付出一些代价去滿足那些吸血鬼。要进油房去做工，事先得找个人介紹，通过工头，交納二斗米，然后这些饥寒交迫的农民，才能走进資本家的油榨坊，去受另一种压榨。

工人們工資很低，这很低的工資还要七折八扣，发到工人手中时，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資本家狡猾透頂，他

們組織了一個“車盤會”，專門榨取工人的工資。陰曆每月十三號發工資，“車盤會”在發工資前大擺酒宴，實際上是研究米價，他們確定米價後，就與米行資本家勾結，運來大批大米，先把價壓低，照這壓低的米價發給工人工資，然後抬高米價，工人拿上低米價的工資，卻買不到低米價的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資本家為了壓低米價，把工資一直拖到二十八號才發，工人米永松拿着二石六斗米錢，到市場只買得兩斗多米和一些小菜。工人們整年是過着缺吃缺穿，忍飢挨凍的生活。

資本家根本不顧工人死活，工人受了傷不但不給錢醫治，還要受害者自己請替工，付給替工的工資往往超過本人的工資。更厲害的是一到春末油榨坊停工後，全部工人便被解雇。於是悲慘的情景，一幕幕地發生了：工人王明治有工作時都養不活全家，妻子要幫人洗衣，母親經常在外討米過活。有一年停榨後，母親得了病，想吃口飯也沒有，哪有錢醫治，不幾天連病帶餓就死去了。妻子周大妹生了小孩，家里沒有一顆米一滴油，街坊們聚集了一點米和油給她，才過了“三朝”，第四天就得抱着剛生下來的小孩，背着個簍子，戴個斗笠沿街求乞。有錢人家，見她抱着小孩，戴着斗笠討米，就知道是生了孩子未滿月的“空肚子”，他們說“空肚子”上門不吉利，周大妹得到一頓斥罵，被趕出大門！不幾天，孩子沒奶吃活活餓死了。周大妹在舊社會生了九個孩子，都是滿了三朝就去討米，五個孩子全這樣餓死了。張丁秀的丈夫，是油榨坊的搬運工人，由於過度的勞累，一場病就死了。留下張丁秀和兩個小孩：一個三歲，一個剛滿月。在那吃人的社會里，這樣的一家三口怎能活下去呢？張丁秀只好靠賣奶糊口，每天在孩子飢餓的哭叫聲中擠出滿滿的兩杯奶

汁，送給娶了姨太太的資本家大少爺和一個快出嫁的大小姐去喝。但她那剛兩個月的小孩却含着空奶頭死去了。她逢人便痛哭着說：他們喝的不是奶，是喝我們窮人的血啊！

住在这街上的七十多戶工人，絕大多數都討過米，每年餓死病死的不計其數。

油號的資本家們呢？他們揮金如土，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資本家楊恒元，仅侍候他的佣人就有男听差、丫头、女工、厨师等七八个。他的四姨太每年要吃几百只鸡和百多只火腿，吃鸡时，只吃皮和湯，肉扔掉不要。資本家徐富隆一家二十余口，不論大人小孩过生日，都要张灯結彩做寿。終日宾客滿堂，酒宴不断。这样的“寿誕”，差不多月月都有，不知花費了多少錢財。

八大油號的資本家就像榨油一樣地榨干了工人們的血汗，養肥了他們自己。

地头蛇为非作歹 穷苦人到处受欺

住在靠河岸跑馬大樓的保長賀德富，是个恶霸，是条地头蛇，二涼亭的人都叫他“賀閻王”。他家里的人不是在国民党軍政界充当爪牙，就是地方上的流氓痞棍。其中有两个国民党軍队的团副官，一个保安队长，一个律师，两个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两个稅官，三个地痞。他家就是这样的一个蛇窟，真是五毒俱全。他們在这一帶地方称王称霸，无恶不作。

賀家可以任意魚肉人民。二涼亭的人們除了遭受国民党各种苛捐雜稅的盘剝外，还得承担“賀閻王”所立的种种稅捐的盘剝。哪家有口角糾紛，他要来“帮助解决”，哪家就得杀鸡打酒款待，事后还得送“脚步錢”（草鞋錢）。拍亲的

从这条街上过，要出“路费钱”。正街药房有一个职工叫曾品之的，从乡里接亲来，路过这里，贺家的流氓贺梅生就挡住花轿吼道：“不拿路费不准过！”曾家送了五块光洋才算了事。更加荒唐的是：连死人埋了，贺家也要收“地钱”、收“地税”。挨着这条街的山边，有一口“冒天井”，人们去担水时，他要收“水费”，说井是他家的，人们只好闷着一肚子气去到老远的河边担水。

贺家的人，经常出入资本家的高门大户，为资本家效劳，就像是资本家豢养的一群恶狗一样，只要主人一句话，就无不敢前往。

一九四八年，年关将近，榨油工人们都盼着资本家按时发下工资，拿到规定的两斤过年肉。结果呢？又和往年一样，工资拖到年关才发；复兴昌的资本家先向工人宣布：“街上没有肉卖，年肉免发了。”其他油号的资本家也跟着这样作。工人们气极了，在米满娃父子三人的带动下，百多个工人拥向复兴昌，质问资本家：“街上有的是肉卖，为什么不发？”资本家见来势很大，便闪着狡猾的眼光说：“马上发，马上发！”直到各油号的资本家都答应发给后，工人们才愤愤退去。谁知就在这天晚上，米满娃父子三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十多个保安团的“粮子”（士兵）冲到门前，猴子脸贺保长左脚踩在门坎上，一手插腰，一手握枪，睁着一双充满血丝的凶眼，指着米满娃父子三个吼道：“该抽你们的壮丁了，快跟我走！”米家父子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儿子想冲出去和他们拼了，米满娃觉得这样会吃亏，就一下站起来，一手挡住大儿子，并斩钉截铁地说：“走就走！”这些坏蛋们把米家父子三人捆走了。与此同时，资本家带着保安团的“粮子”大肆镇压

工人，并威胁工人说：“老子不要你们干了，谁要造反，就看米满娃的下场！”接着便开除了四十多个工人。

二凉亭除开贺保长这条大地头蛇以外，还有一些工头、流氓、痞棍，他们经常在街上为非作歹，酗酒打人，聚众赌博，调戏侮辱妇女，经常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工人傅友生的老婆怀孕在身，流氓車大皮见了，便乘她丈夫守榨之夜，强奸了她。这个灭绝人性的家伙为了灭口，竟把她杀害了。住在这条街上的劳动人民，没有过一天安静的日子。

受匪祸死无雪冤之处 遭兵灾一街十室九空

在旧社会黑暗的日子里，土匪竟敢上街来“捉羊”。住在这条街上的工人雷州文叙述了他的遭遇，

“我在油坊帮工，省吃俭用积得三十多块光洋，一九三三年，租了间房子成了亲。心想这下总有个窝窝了。哪知没几天，飞来横祸。一天晚上，月亮很亮，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被一阵急骤的打门声惊醒了：‘查户口了，快开门！’我觉得事情不妙，就赶紧叫老婆躲到岳母的床下，门一打开，就跳进来一个矮敦敦的胖子，头戴歪帽，身着中山装，右手握一把闪亮的利斧。接着又跳进来一个，头缠围帕，撒总吊在右耳边，腰上插一把匕首。他们一个扭住我的左手，一个扭住我的右手，将我捆了，马上又从竹籬笆边窜出两个人，手拿柴刀，满脸杀气地对着我。他们连推带搡把我押到了車皮溪一个姓楊的土匪头子家里。土匪头子说：‘积了钱，怎么不拿点来孝敬我？’我刚要说话，两个土匪就把我按在地上，压杠子，灌辣子水，我登时死过去了。约莫半个时辰，我才醒转来。这时我已被他们丢在炭房里了。不一会，街上一个姓林

的流氓来看我，他装做吃惊的样子，要我拿十四吊錢贖人。我的天！油坊作工，一个月只有一吊二百錢，生活还糊不了，不拿錢，又脫不得身，就得死在这里。想来想去，沒有別的办法，只好答应。

“脫身回家后，岳母、老婆三人大哭一場。把老婆打猪草、扯筒子、砍柴卖得的四吊多錢，卖衣物的一吊多錢，周围邻舍帮助的二吊錢，到油坊高利借来的七吊，好不容易湊成十四吊，托人送去，才算完事。

“我被捉去以后，我的岳母會到保安团报信，他們要了岳母两吊錢，最后說这不干他們的事！穷人連告状也无門啊！事情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我在楊宏源榨房榨油，見資本家、賀保长、姓楊的土匪头在一起划拳飲酒。我心里才明白，原来官匪都是一家，这是什么世界啊！”

的确，在旧社会官匪是一路貨色。有一年，一个土匪小头目路过二凉亭，在一家杂货店买东西，店主不認識他，不知怎地爭吵了几句，就被那个土匪一扁担打得头破血流，不久就死了。可是駐在礪堡里的保安团和当地的“地方官”，对这样的人命案件誰也不過問，让凶手逍遙自在。人民的生命如同螻蟻，任凭他們摆布。

保安团的“粮子”更是凶狠，到处殘害百姓。他們經常在街上零打碎敲，不是拿豆腐店的豆腐，就是“賒”杂货店的貨物。最可恨的是替保长抓壮丁，多少戶被他們害得家破人亡。篾匠明永全是个独生子，国民党也要抓他的壮丁。永全知道后，白天就躲进山林，夜晚就睡在附近山上的防空洞里。賀保长抓不住永全，便带着保安团，抓去了他的父亲，关在北辰宫的鎮公所。永全听到这个消息时痔疮正大量出

血，剧痛难当，他不顾一切，爬出防空洞，跑到鎮公所要換回父亲。反动派哪里肯答应，直把永全折磨得奄奄一息，家产一空，方才了事。

有一次，这些恶棍新抓来一些壮丁，关在蕭恒庆油榨房过夜，有一个壮丁想跑，刚爬上墙头，就被哨兵一枪打死在墙上。住在这条街上的賀洪秀刚生了小孩，丈夫就被抓去当壮丁，家里无錢无米，未滿“三朝”，就拖儿带女討米求生去了，弄得家破人亡。

換了人間

一九四九年八月，洪江解放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二凉亭街上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翻了身做了主人。那些欺压人民的工头、恶霸、旧官吏、慣匪、痞棍，該杀的杀了，該劳改的劳改了。

八大油号于一九五六年实行了公私合营，一九五八年集中迁移到蘿卜湾，建成了半机械化的植物油厂。原来的榨油坊相继改建和扩建成五金机械厂、木器厂、农具厂、火柴厂；茅草小屋成了紅磚青瓦的职工宿舍了。工人們在不同的工厂里，为国家創造着财富。曾經受过殘酷盘剥的工人米永松的孙子现在是植物油厂的副厂长；榨油工人吳再隆现在是該厂的党支部副書記；过去受压迫受欺凌的雷州文的爱人陈爱玉，现在是二凉亭管理区主任；卖奶糊口、熬过千辛万苦的张丁秀，现在是冻青坪管理区主任；周大妹的四个孩子都是工人，生活过得很好。两代討米的賀洪秀，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人民解放軍空軍战士，一个是陸軍軍官，他們正保卫着祖国的領土和領空。

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的

傅承君

在腥風血雨的舊社會，工人階級遭受了多少苦難！肥頭大耳的資本家，心比毒蛇還要惡毒百倍。他們的百萬財富中的每一厘錢，都是從工人身上榨取的血汗骨髓啊！解放前，資本家周子西、江一山等創辦青島華北火柴廠時，全部投資只有三萬五千元，可是三年以後，就獲取暴利一百萬元之巨，成了百萬富翁。讓我們先看看這個廠的工人被剝削和被迫害的部分悲慘遭遇吧。

這個廠明文規定：工人每天凌晨三點半上班，晚上八點放工。動勞時間達十六小時以上。多數工人家里沒有鐘表，只能早到，不敢晚來。工人們多在早晨兩點多鐘就到廠門口。早到了，還不能早進廠，不論嚴冬酷暑，刮風下雨，都得在大門外悄悄等候，連大聲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否則，如果驚動了資本家的“看門狗”，他們就要行凶作惡，往門外潑水澆你。冬天潑涼水，夏天潑熱水，有時還拿着馬鞭子，出來亂打一陣。有的工人因為來的太早了，被查夜的捉住，還得讓你吃苦頭。輕則挨打，重則送命。

進廠如進監牢

工人們上班之後，封建把头個個手拿松香大板，坐在案子上，瞪着虎狼眼，監視着工人。死在他們手里的工人着實

不少。一九四〇年，有一个十一岁的童工，因为把一盘杆子碰翻在地上，外号张扒皮的大狗腿子，顺手拾起七格盘子朝着那个童工的头上就砸，从車間一直砸到大門口。第二天那个童工就吐血死了。

为了逼着工人多干活，资本家让把头出面规定，每过一点半钟，要驗一次貨。驗貨时搖鈴为号。鈴鐺响过，每人必須裝出四盘火柴来。那时造的是硫化磷火柴，裝得急了，很容易摩擦起火，烧伤手脸。可是裝不起四盘来，就得受罰或挨打。每次受罰要罰掉两盘火柴的工資。罰款归把头私分，仅此一項每个把头每月能榨取二十多元錢。一天搖十多遍驗貨鈴，如果每次受罰，一天的工資就罰光了，一家老小吃什么？因此，不少工人只好忍痛挨打，有时被打得連走路都走不动了。女工张秀嫚怀孕好几个月了，身子笨，她怕裝得慢了受罰，有一次看見吊車卸下杆子，就快跑去端杆子，这也惹恼了大把头，他一边大罵：“××养的，誰叫你搶杆！”一边用木板子猛打张秀嫚的后背。张秀嫚被打得昏倒在地，鮮血从褲脚里涌出，狠心的大把头将她拖到案子空擋处时，胎儿就掉下来了。资本家的爪牙們，就是如此殘无人道！每次搖驗貨鈴，就有許多工人遭殃。所以聽見鈴声，人人胆战心惊。工人就給驗貨鈴起了个名，叫“落魂鈴”。

除了“落魂鈴”，资本家还規定了种种罰規。如：工人們歪歪头，要罰五行火柴；誰說一句話，要罰两盘火柴。发现誰的地方有掉杆，就把他裝的火柴全部拿走。有一次，譚立瑞看見一个送盒工掉了一盒，就关照他一句，被把头刘作武聽見了，就要罰他四盘火柴。譚立瑞拒絕受罰，被把头們痛打了一頓，一連打断了七八根大木板子。王天瑞因常被打得

肿痛难忍，有一次，他偷偷地把两块树皮垫在屁股上，结果在挨打时被把头发现，马上被砸了个皮开肉绽。把头在打人时，为了既打的疼，又不把工人打残，以便继续为他们卖命，他们还总结了一套打人的经验，说什么“轻举重落先打腕，伤不了骨头害不了命”。

中午，吃饭铃声一响，工人们得赶快跑出车间，因为资本家规定吃饭时间不得超过十五分钟。而送饭的家属被挡在厂门外，要排队挨号，接饭的工人在厂门内也要排队挨号。数百名工人，等到把饭接到手，时间已经剩不了几分钟了。不管你吃完吃不完，把头一吹哨子，就得赶快往车间里跑。如果进车间迟了几分钟，把头早把你装好没交的火柴全部拿走，你就算白干了。

放工象过险关

离放工还差两三个钟头的时候，资本家的眼珠子瞪得象恶狼一样。制造部每天向装盒部输杆至下午五点为止。这时，装盒部不管接收了多少杆子，都必须全部装完。装不完不放工。经常是因为收杆太多，往往要干到晚上十点多钟。而这段时间，资本家的那架计时钟，走得特别慢，一小时足有两小时长，这分明又是资本家搞的鬼把戏。

工人们干完一天活还得过一道资本家规定的搜身屈辱关。狗腿子们满脸凶气地将你周身上下摸个遍，象检查囚犯一样。稍有违抗表情，就会招来打骂之祸。有一次，一个姓赵的装盒工，想早些回家，没有挨号搜身，就被绑起来吊到切纸房里，资本家江一山亲下毒手，用钢丝鞭抽打。口中还念念有词：“破坏厂规，罪有应得。”打完之后，就把那位工

人开除了。

童工更苦

童工和成年工人一样，每天从早上三点半钟，一直干到晚上八点才下班。成年工人干了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经过搜身关，可以出厂回家了。而童工这时还不能出厂。资本家规定，童工必须留下，先清扫车间，然后再给把头端送洗脸水、洗脚水，百般受虐待。到十来点钟出厂时，把头们还要在他们的脸上盖上一个戳印，做为已经留下干过零活的标记。第二天进厂时，如果谁的脸上没有那个戳印，把头就说你昨天晚上提前溜了，马上就是一顿毒打，有时还要扣下入厂证。没了入厂证，就等于开除了。逼得童工们回家后，连脸也不敢洗，日积月累，满脸都是戳印，不成人样。资本家的心，狠毒到何等卑鄙无耻的地步！

无毒不施

工人披星戴月，象牛马一样的干活，为资本家换得了百万财富，而资本家发给工人的工资，却低得可怜。一个童工每月工资只有一、二块钱，连肚子也填不饱。技术高的成年工人，也多不了几块。以工人冷宝山为例：他一家四口，有三口在火柴厂做工，然而收入的工资连一个老母亲也养活不了，母亲到底饿死了。可恨的是，资本家连发给工人们那点微薄的工资，也想尽种种办法再抢回去一部分。再如安秀兰的弟弟被他们活活地折腾死了，资本家还克扣了死者的半个月工资，死者的母亲，在厂门口痛哭三天，要求发还那半个月工资，人面兽心的资本家让狗腿子把她骂着撵走了。资本

家养着一批无恶不作的走狗——封建把头，为所欲为地欺压工人。资本家江一山这样说：“养好几条看家狗，高枕无忧不发愁。”碰到看家狗压服不了的时候，周子西和江一山就买通反动官府，勾来军警特务镇压。周子西、江一山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竟向日寇捐款二十一万八千余元，来杀害自己的同胞。装盒工人周德昌“得罪”了封建把头，他们便以周与八路军有联系，进行陷害。用三百块银元，买通汉奸杨流球，将周抓进日本宪兵队，判了砍头死罪。周德昌的老母亲借了五块银元送到刽子手手中，才将砍头改为枪毙。

请看！人面兽心的资本家——周子西、江一山，他们的财富中，哪一分哪一厘，不是工人的汗水和鲜血啊！这阶级仇，血泪恨，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双手粉碎旧世界

周永龄 李欣

我們訪問了长沙电厂，了解了它在新旧社会中的不同情景。

一进工厂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成行的夹竹桃迎风招展，崭新的建筑物栋栋毗连，吊煤机、鼓风机和马达奏起欢乐的进行曲。一根根高压线从这里伸展开去，把光和热送给全市用户。解放以来，这个工厂的基本建设面积比解放前三十八年的总和还大两倍，一九六二年的发电量比解放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增加了四点二倍。

车间里，上晚班的工人结束了八小时的劳动，洗罢澡，收拾得干干净净，回家了；上早班的工人，穿着工作服、长统套鞋，戴着安全帽、劳动手套，走上劳动岗位，愉快地进行操作。

但是，当我们听到了老工人对解放前生活的控诉，我们的心又回溯到那凄风苦雨的当年。

进厂难 三个铺保九连环

“解放前，要找到一碗糊口饭，真不容易！”老工人们感叹地说：“那时，我们没有生活的权利，只有受人剥削，挨冻挨饿的‘自由’。”工厂是资本家的，他们作威作福，巧立着各

种名目的剥削制度。解放前，湖南电气公司（即现在长沙电厂的前身）制订了一个“工人管理规定”，上面写着的洋洋四十六条，就好像四十六根绳索勒住工人的颈项。譬如说，工人入厂“须觅得妥保，填具保证书”。铺保少则一个，多则三个；作保的铺子还要有钱有势的金银号、绸缎铺、钱庄。有了铺保，还要十个连环保。穷人怎能高攀得上大老板？工人们还没有进厂，就得经受住沉重的盘剥。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宋文兴由于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想在电厂找个工作。起初，他想方设法找了一个铺保，送到厂子里。谁知资本家却说：“一家保证无效，起码三家。”宋文兴找到这一家铺保，已经够费力了。他只好人上托人，保上托保，又是筹钱送礼，又是登门求情，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家鸡鸭铺和一家杂货店作保，他以为可以了，满怀希望地去见电厂的管理员。可是，管理员冷言冷语地说：“你就不能找到几个大一点的铺家？”宋文兴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并且保证只要让他入厂，一定发狠干。那又有什么用呢？“找不到，就莫进来，期限是三天！”这就是答复。为了生计，宋文兴不分夜里白天，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忙着找铺保。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最后总算托人找到了三家称得上大一点的铺家作保。但进厂“手续”还不止于此。管理员又要他找了十个连环保。连环保上规定：一人出事，其他九人同罪。这些还不行，把头还给他两个大水桶，迫着他挑河水，从河边挑到几丈高的河岸，跑上跑下，“测验”他的力气。直到这些关都过了，宋文兴才算入了厂。

工人苦 生老病死有誰問

工人进了厂，要經得住沉重的劳动。“电话接綫工管理規則”上明文規定：每日工作時間，由上午八点至夜間十二点，整整十六个小时。一年干到头，从来就沒有有什么假日礼拜。

六月炎天酷暑，在工头監視下，工人赤着脚，在气温高达近六十度的鍋炉旁出煤渣；寒冬腊月，工人光脚踩着冰雪去挑煤，一担两百斤，一个班时就要挑七八十担。手脚烫起了泡或是冻伤了，有誰过問？什么劳动保护用品，連看也看不到。工人们要求买一点紅药水、几粒奎宁丸，资本家也不肯。

就是一台机器，运转時間长了，也得加点油；但是一个工人，尽管你累得腰酸背痛，也别想休息。你坐下来，喝口水或是吸袋烟，一被工头发现，輕則挨打，重則“飯票子过河”（被开除）。有一次，天下着雨，滿地泥濘，一个姓胡的老工人正和另外一个工人担着煤上跳板。他因年老体弱，加上担重路滑，一不小心，摔倒了。站在旁边的发电課长大声責罵：“老家伙，不中用！”第二天，这个姓胡的工人就被开除了。

那真是恶人当道，穷人受欺的世道！资本家不管工人的死活，再危险的活也要叫工人去干。有一个老工人說：“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階級兄弟刘谷生的死！”

那是一个炎热的六月天，有一座炉子刚刚熄火，工头就逼着刘谷生去修汽鼓。但是资本家只顾賺錢，不肯停止其他鍋炉的生产。刘谷生赤身露体爬进了鍋炉，刚一进去，另一个鍋炉的高温蒸汽正巧倒冲过来。只听得一声惨叫，刘谷生

渾身皮肉綻開，頓時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工人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廠里。狠心的資本家走來，還沒有瞥上劉谷生一眼，却問爐子修好沒有。後來，還是工人們湊了一些錢，弄了些土藥給劉谷生治療，但因傷勢過重，就這樣悲慘地死了。解放前進廠，現在仍在長沙電廠的一百零一個職工中，他們的直系親屬，有六十一個被國民黨和帝國主義殺害，九十七個被逼死或是餓死。這是多么大的血海深仇！

勞動艱辛，生活更是痛苦。工人住的宿舍，是一種六丈見方大的土工棚，一間就要睡六十多人，真是寸步難移。工棚里沒有窗戶，成天見不到陽光。地上盡是積水，進進出出還要墊着磚頭。晚上睡覺鞋子只能擱在枕頭底下。床鋪和被子散發的霉臭味把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蚊子、臭蟲成堆，工人們哪能睡得上一晚好覺！他們說：那種宿舍還不如現在人民公社的牛欄房。

工人的廚房和食堂就在屋檐下，搭上兩塊爛板子就成了吃飯的桌子，有時干脆在地上吃。一年到頭是粗米淡菜。

幾人富 萬人呻吟無活路

工人們拚命地勞動，工資却微薄得可憐。就是這點微薄的血汗錢，還要受工頭的層層剝削。每月發工資前，工頭把工人的工資領來，先拿去放三天折息，然後才往下發；發時，還要從中抽出百分之三的所謂“頭人錢”。另外，每逢經理、工頭生日，工人還得送禮。

一九四八年四月底的一天，工人彭紹生剛領到工資——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搜刮民財而發的偽鈔，就拿行李袋背着去買東西，許多鋪子都不肯要，要收銀圓。彭紹生只好用偽

鈔去換銀圓，一打听，說一万二換一块。他赶紧跑去換，滿心想着多換几个錢，等他滿头大汗跑了几条街，一块銀圓的价格却又涨到了二万八。他最后背了这袋鈔票到一家荒貨担上去，問老板能买什么？老板看了看这袋錢，給了他一个旧脸盆。

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工头的左扣右刮，物价的飞速上涨，工人們連自己都难养活，哪里还顧得上妻儿老小？有一次，老工人刘桂清刚刚接到工資，老板就来逼賬：“刘桂清应繳伙食費两块四，上次欠一块二，共計三块六。”刘桂清說：“我家还有四口人要生活……”話音未落，老板夺过了他手中的錢，數了數說：“尾欠一毛，三天內交齐。”可怜刘桂清辛苦一月，还加了十个晚班，却空着双手走回了家。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就去挑河水卖，好不容易才混过了那个月。資本家、工头刮淨了工人的薪水，又向工人放“夜夜錢”，規定每借一元，过一夜要付一角息，五天不付，息上又要滾息。有的工人直到解放前夕，还背着一身的債務。

凡人富，万人饥寒不得活。这正是旧社会的写照。在那种社会里，有錢有勢的吸血鬼可以大吃大喝，任意揮霍，穷苦的工人即便做到死，还不得温飽。請看当时这个公司的官僚資本家的生活！

經理每月的工資是六百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工資的一百七十一倍多。他們用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三十五年之內，公司資本就由三十万元增到一千万元，純利九百七十万元。

經理住的是高樓大厦，每日三餐酒肉飯菜，就連家里的

哈巴狗喂的也是牛肉。还专门雇了四个工人侍候，饭菜茶水要人送到手。盛夏酷暑，工人们挑煤渣，热得透不过气；经理和太太却在湘江上，乘着游船，饮酒作乐。那时，厂里的食堂分三等，进出厂门的证章也分三种。工人有事到经理室，进去后，说话时还得远离几尺，低下头。这就是资本家标榜的“人权平等”！

工人王国华洗水池时，淹死在池里，资本家说冲散了他的财运，不准把尸首从厂门口抬出去。三天以后，尸首发臭，工人们只好找几块板子把王国华的尸首从围墙上吊了出去。

一九四七年正月里，勤杂工周全胜由于过度劳累，被折磨死了。临死前，他想跟资本家借点钱治病，资本家见死不救，还说：“这有什么可治的！”

这些都是血迹斑斑的记录，那高耸的烟囱是它们的见证，那滔滔的江水也永远洗刷不了血和泪的印痕。

解雇易 失业饥饿紧相逼

“进厂难，出厂倒是容易。”工人们说：“只要你稍不如资本家的意，你随时就可能被开除。”解放前，湖南电气公司专门制订了解雇工人的十七条规定。

条文里说：

“傲慢无理者记过。”

“迟到早退者记过。”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解雇：

“因病请假六十天以上者。”

“因事請假三十天以上者。”

“包裹物件未填門票携出者。”

“記大过三次者。”

“本公司认为不能繼續信任者。”

.....

其实，資本家压迫工人的規章还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在我們面前，就摆着許許多多这样的懲罰书，

“临时工胡桂成随地小便記过一次。”

“姚阿祥性情粗暴記大过一次。”

“姜长春去銀行取支票延誤一天，記大过一次，罰工資三天。”

看守工吳冬生在劳动中右脚被打断了，被开除；宋文兴吃臭菜、霉米，患了痢疾，被开除；彭紹生因为拆了一个不用的灯头，被开除；就連有些大学毕业生实习一年以后，也无緣无故地被“辞退”了。

在旧社会里，工人的飯碗“挂在腰上跑”，失业、饥饿像魔影一样地伴随着他們。他們飽尝了失业的痛苦，受尽了生活的煎熬。彭紹生被开除后，爱人要生小孩，不但穷得沒法請人接生，連买草紙的錢都沒有，只得家里堆上煤渣生。刘德福因参加罢工被开除了，一家四口生計无着，只得靠炸油粑粑和卖荸薺度日。那情景真是：家里老小餓得哭，有口难說心头苦。

鬧革命 双手粉碎旧世界

在資產階級的殘酷压榨面前，工人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火种。工人們决心反抗、斗争，用双手粉碎旧世界。

还是在一九一七年，这个工厂的許多工人便参加了毛主席当时在第一师范举办的工人夜校学习。从学习中，他們提高了文化，提高了觉悟，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认清了灾难的根源。一九二六年，在郭亮同志的领导下，电厂工人成立了工会，建立了工人糾察队。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为了保卫紅色工会，他們冲鋒陷陣，和反动軍警展开了武装斗争。

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前夕，这个工厂的工人又开展了护厂斗争。那年夏天，白崇禧匪軍狼狽逃出长沙时，瘋狂地叫嚷着：“能搬走的全部搬走，不能搬走的通通炸掉，决不留給共产党。”电厂也就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工人們在党的地下組織领导下，成立了护厂委员会。糾察队员在厂門外装設了电网，安装了紅綠訊号灯和联系电鈴，并且在机房旁边設立了瞭望台，日夜輪流站崗放哨，严防敌人破坏。八月三日晚上，伪警备司令部一群匪徒端着美式冲鋒枪，背着炸药包，来到厂門口，揚言要把工人和厂子一起炸掉。顿时，紅綠訊号灯亮了；电网上閃跳着高压电的火花，早已埋伏好的糾察队员全副武装，挺身而出，厉声申斥道：“誰敢动手！”匪徒們像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逃跑了。工人們用生命保住了工厂，使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八月五日，工人們欢天喜地地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迎接我人民解放大軍进城。当晚，全市灯火通明，笑声盈耳，歌声喧天，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之中。

換人間 幸福生活說不完

劈开云雾見青天，工人們深深感到是共产党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了他們，是毛主席給他們带来了幸福。我們在这个

工厂工人居住的电业二村，訪問了許多老工人的家庭，听到了他們讲述的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情况，也亲眼看到了他們現时的幸福生活。

电业二村所在地原是荒田坟堆，解放以后，政府在这里盖起了几十栋崭新的工人宿舍。宿舍里有自来水設備，有澡堂和俱乐部。这时，有位老工人指着他的住房对我们說：“过去，我做梦都沒想过自己能住这样的高楼，真是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是在解放前，我們当工人的不只不能住这样的房子，連进都莫想进去。”如今，他和其他五位老工人一起，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的規定退休了，在这里度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厂里的领导同志还經常去看望他們，問寒問暖。老工人黄光复解放前一家八口，生活无着，被迫将自己的儿子給了別人，已經十八年了，他日夜思念着。一九六三年三月，厂里又想方設法替他把儿子找了回来，并且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老人說，他的宿願实现了。老工人陈超庭一九五一年因工負了伤，十二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給他治疗，送他住疗养院，薪水还照发。这使他极为感动，他說：“要是在解放前，我只能和吳冬生、周全胜一样，死路一条。”

我們来到了老工人周紹和家里，屋里收拾得乾乾淨淨。他現在已經五十七岁。他是在一九五一年当他四十五岁的时候結婚的。寒暄一陣，我們便談起他結婚的事情来，

“解放前，你做了十多年工，怎么沒結婚？”

“讲結婚倒容易，那时，穷人家哪里养得起老婆！”

“当时你的生活情况怎样呢？”

“解放前，我在电厂工作了十多年，每月的工資是七八

块光洋的底薪，伙食要吃五元，家里还有四五个人的生活要我维持。”他沉浸在往日生活的回忆里：“我置了点什么？一床烂被窝、一顶旧帽子和一床草席，棉衣还是从家里带出来的。”

接着，他带着欣喜的心情，畅谈了他现在的生活：家里三口人，自己和过继的儿子都在厂里工作，生活无忧无虑；家里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添置了整套家俱。周绍和激动地说：“共产党来了，我才有了家。”

周绍和一家，不，长沙电厂每一个工人的家庭都起了很大变化。他们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愉快地劳动，决心用双手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们从院子里走过，孩子们正在游戏，《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阵阵传来，唱出了对新生活的赞美。来到第十栋一百二十七号房间，老工人彭绍生又在给他的孩子讲着往日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故事。那个坐在床上、个儿高大的彭立清，就是当年在煤渣上生下的。他现在已经十四岁了，读初中二年级。他下面的两个弟弟是解放后生的，都在小学读书。孩子们起初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那样的魔鬼，问爸爸：“资本家真有那么狠吗？”“傻孩子，资本家不狠，就不是资本家了。”说罢，彭绍生指着他过去仅有的家当——一口木箱、一个脸盆、一本欠账簿和几件烂衣服，说：“孩子，不能忘记过去！”